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孫善豪　博士

# 馬克思的女性主義與女性的馬克思主義

研究生：陳韋瑄 撰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一月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目錄

第一章　導言 ..... 1

第二章　女性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 ..... 11

第一節　Dalla Costa 與 James 的家務有給之討論 ..... 11

一、“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 12

二、反對意見 ..... 16

三、小結 ..... 17

第二節　Hartmann 所指出的，馬克思的性別盲 ..... 17

第三節　Jaggar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評 ..... 20

一、馬克思主義的人性本質之概念 ..... 20

二、馬克思主義人類本質概念的問題 ..... 23

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概念 ..... 26

四、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概念的問題 ..... 29

小結 ..... 31

第三章　女性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概念之改造與應用 ..... 33

第一節　家庭主婦之處境—異化 ..... 33

第二節　性別盲之解藥—性別分工 ..... 37

第三節　超越既有的馬克思主義—當女人作為一種商品 ..... 40

小結 ..... 45

第四章　全新的提案—女性的馬克思主義 ..... 47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之歷史條件 ..... 48

第二節　拜物的女性主義 ..... 54

第三節　生產與再生產—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之關係 ..... 57

一、再生產的再瞭解 ..... 57

二、使用價值與價值到相對價值與等價物的被表現與表現關係 ..... 60

三、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 ..... 63

小結 ..... 64

第五章、結論 ..... 67

參考資料 ..... 71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第一章　導言

女性，作為一個可見的政治行為者，並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更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她在過去的政治理論以及政治實踐中一直是隱形的，這個隱形並非主動的藏匿，而是被動的遮掩。在政治理論中，古典的政治理論家不是完全忽略不提男女性別，一律以「人（man）」這個看似中性的名詞來稱呼理論的行為者，就是認為女性不夠資格參與政治事務，直接將女性排除在政治理論的討論以及政治領域之外。在政治實踐中，直至 1893 年，紐西蘭通過公民普選權，女性才開始擁有不受限制的投票權；1918 年，德國女性才擁有投票權；1920 年，美國女性獲得投票權；英國則到了 1928 年才讓女性與男性公民擁有同等的選舉權。在過去封建制度中，性別並不是一個人參與政治過程與否的標準，因此，即使在封建時代少有女性的政治參與者，很少人會去質問為什麼女性並不是政治行為者的一份子。然而，隨著民主國家的建立、自由主義的興起，「人人平等」的概念開始普及，但在制度上看到的是，選舉權只對男性開放，於是有部份女性基於自由主義的概念反思自身的處境後對自由主義提出批評，另一方面也展開爭取投票權的行動。

這一群人是最早的女性主義者，他們透過自身處境看到自由主義尚未解決的問題，認為自由主義強調「理性」，同時又把女性標籤化為「情緒化」、「欠缺理性」的人，於是認為女性不適合參與政治事務，更不會主張女性應該要有基本的政治權利。對此，這時的女性主義者依著自由主義的途徑，著重的是制度上權利的爭取，著名的像是美國女性爭取投票權的運動。1917 年 4 月美國宣佈參與一次大戰之後，Alice Paul 與 Lucy Burns 堅持每天在白宮前面為女性投票權舉牌抗爭。當時此舉受到許多撻伐，認為在國家存亡之際不應以個人權利造成國家內憂。這個活動持續到 10 月，Paul 與 Burns 和其他參與者以「阻礙交通」的罪名被逮捕入獄。Paul 在獄中以絕食的方式進行抗議，又受到被獄方強迫灌食等不人道的待遇，在七個月之後一行人才被釋放。直到 1920 年美國才通過第十九號憲法修正案，確立了美國的女性投票權（陳清泉 2009）。然而，女性在獲得投票權之後，如同男性，並不從此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在政治場域中的女性行為者仍是少數，因此又有「保障名額」等制度設計，確保女性及其他弱勢族群得以發聲。但女性主義者可以發現，他們所希望的平等遲遲未來。即使有立法禁止，但對女性的性騷擾、暴力行為、強迫性行為等等事件仍層出不窮。

對自由主義提出批評的還有馬克思主義，相對於女性主義者跟隨自由主義者追求政治制度上的修正，馬克思主義者更著重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以歷史唯物論的方式進行研究，認為所有制度都有其物質基礎，若不改變物質基礎是無法成功變制度。馬克思主義從經濟的角度出發，用「階級」作為主要分析概念，看到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在經濟場域的表現形式）下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並同時許諾了一個新版本的自由、解放的未來。馬克思所發展出的，對自由主義有力的批評對於部份女性主義者來說是很吸引人的，他們認為馬克思的方法可以說明為何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尋求政治制度上的改革未果，也能夠避免基進女性主義本質主義的問題。就馬克思主義看來，女性工人和男性工人一樣，都是在資本主義之下受到資本家剝削與壓迫。至於在家中的女性，她們從屬於男性的處境，馬克思主義認為這是因為她們沒有參與社會生產，在經濟上依賴於男性，只要把女性也整合進社會生產中，女性的從屬地位將會被消滅。

1960 年代，美國的新左派運動中，女性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基於同對現實的不滿進行合作，希望能夠打造一個解放的社會。然而在合作過程中女性面對了兩種問題：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經驗中的工作分派，另一方面則是理論上的衝突。在工作分派的部份，女性主義者質疑著在新左派運動中「是誰打掃辦公室／誰把它弄亂的？誰書寫創作出宣傳傳單／誰把它打字出來？誰在會議中發言／誰做會議紀錄？誰透過性關係提升了地位／誰透過性關係給予別人地位？」（Sargent 1981, XIII）在這些日復一日的工作分派中，女性主義者發現所面臨的處境正是她們所想要改變與推翻的——女性負責從事較低階、不重要的瑣碎工作，在運動中並沒有發言權，並且，女性必須依附男性，滿足男性的需求才能獲得權力。面對這樣的狀況，女性主義者選擇的是離開這個處境，自立門戶，建立只有女性參與的女性運動組織。相對（或說如同）[1]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的，這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已經被男性宰制給分裂了，因此女性需要一個自主的組織來確保那些與男性利益有衝突的女性利益在改革過程中不會被犧牲。

既有的女性解放策略開始被懷疑，部份女性主義者開始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理論，認為人因為性別而有不同的境遇，女性所受的壓迫是最根本與基礎的壓迫形式，透過瞭解這種最根本的壓迫形式可以獲得解放其他壓迫形式的概念（Tong

[1]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主張討論女性議題的人造成階級分裂，應以階級革命為優先，等到階級革命成功，所有人會得到解放。馬克思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的相同之處在於他們皆認為階級利益會被一特殊屬性的議題討論給分裂。如列寧對蔡特金（Clara Zetkin）的批評（Jaggar 1983, 243）。

1996, 123），也因而，女性的解放鬥爭優先於所有其他形式的解放。這一流派被稱為基進女性主義。[2] 基進女性主義者注重的是性別差異，並常將其視為是由生理決定，並將其普遍化。他們推翻傳統政治理論對政治領域的定義，認為「個人即是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性活動與生育問題也是政治理論研究、應用的主體，並也構成了整個社會的物質基礎。對基進女性主義者來說，男性宰制是基於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普遍性控制，意圖控制她們的性與生育能力，這必須要透過女性達到性與生育的自決才能超克（Tong 1996, 125）。

基進女性主義為傳統政治理論加入了全新的範圍與討論，但有部份女性主義者並不完全認同於基進女性主義對於女性處境的分析。他們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認同，認為基進女性主義把女性處境普遍化，不分歷史、文化，所有女性都受到同樣的壓迫，而看不出有些人是被迫生下小孩，另一些是被迫不能生下小孩的差異，也沒有看出「性別」並非天生自然，而是在社會中形塑出來的。如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一樣，這些仍然認同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者在實際投身進入馬克思主義運動之後發現以「階級」為核心概念的馬克思主義之中似乎並沒有「女性」的容身之地。女性議題被認為是在階級問題之後，在解釋階級問題之後同時也能獲得解決。就像在一次大戰時仍爭取女性投票權的 Paul 與 Burns 被認為是禍國殃民的亂源，在左派活動中的提出女性議題的人也被認為是為了一己之私為更大革命造成內憂的亂源。然而，講求物質基礎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要注意到，即使到了今日，大量的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中，但女性議題並沒有因此減緩，反而在勞動力市場中仍然可以看到女性與男性的差別待遇。根據全球經濟論壇發表

[2] 基進女性主義並非是在二十世紀整個女性覺醒所產生的流派，它是由一小群人所發展而出的，而這一小群人大體上來說有以下這些特徵：白人、中產階級、受過高等教育、美國女性。這一派除了有從新左派運動出來的人，也有因認為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NOW）太過保守而離開的人，還有反越戰的人（Jaggar 1983, 83）。基進女性主義根據父權體制對於不同面向的壓迫情況之關心，而有不同方向的發展，如藝術、靈性、生態、生殖與母職、性別與性、色情、暴力等等。著名的基進女性主義者有：Shulamith Firestone、Germaine Greer、Kate Millett，與 Mary Daly 等人。Firestone 在其著作《性的辯證》（The Dialectic of Sex）中指出父權體制是基於兩性的生理差異—也就是生殖功能的不同—所發展出來的。對她來說，性別就是一種階級，而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並未注意過這件事。Firestone 認為要打破這種階級劃分，必須消除生殖的生理差異，也就是透過科學、科技的發展，使女性不再獨自承受生殖帶來的不便（Tong 1996, 125~28）。Greer 則在《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一書中指出女性呈現的被動其實就像男性被閹割一樣，女性在青春期受到父權式家庭的影響變成女太監，開始學會放棄自主權、尋求別人的指引、採取被動的生命態度（王瑞香 1996, 109）。而 Millett 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中確立了男女間的關係即是一種權力關係，這關係是透過「性」表達出來的，因此性即是政治。在這種男性宰制女性的權力關係—也就是父權體制—中，「女性」要生存，最好表現出「女性化」的舉止，否則很可能會遭遇野蠻、暴力的對待。即使在一個男女較為平權的社會中，父權體制依然透過性別角色刻板化，使婦女接受自己的次等地位（王瑞香 1996, 110）。

的 2013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3] 可以看到，普遍來說女性勞動參與率低於男性。[4] 透過調查也發現，即使男性與女性從事同樣的工作，他們的薪資並非都一樣。[5] 在政治場域也有同樣的現象，在階層中少有女性上位者。[6] 整體社會是如此，在馬克思主義運動中也是如此。

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社會運動中實務上的衝突除了在新左派運動內的權力分配問題之外，還有實際政策執行上的問題。如 Mariarosa Dalla Costa 與 Selma James（1972）認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對於女性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並沒有為女性帶來任何改善，尤其是在生產模式之性別分配仍較為傳統的義大利中，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遠多於進入勞動力市場中的女性，馬克思主義政黨所提出的改革對於她們並沒有什麼實際的影響。因此她們就馬克思主義「女性獨立始於經濟獨立」的主張發展出「家務有給」的想法。由於這個主張一方面與馬克思主義主張把女性整合進社會生產的概念衝突，另一方面也可能強化女性主義所不樂見的，女性更加被綑綁在家庭領域中，因此受到諸多討論。據 Molyneux 的統計，在英美兩地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版物中，在 70 年代的十年間關於家務勞動的論文有 50 篇以上（上野 1997, 42）。雖然此運動在義大利發起，且之後在加拿大也成立了相關的組織，不過隨著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比例大幅增加，以及理論上的反對意見者眾，此運動至 80 年代即漸漸沒落。雖然如此，但在討論過程中，（大多是女性主義者）發現馬克思主義對於家務勞動的討論並不足以滿足新的提問。社會運動中實際的衝突與政策執行效果不彰，讓女性主義者思考這是否反映的是理論本身的問題，因此轉而回頭檢視馬克思主義理論。

---

[3] 《全球性別差距報告》由世界經濟論壇於 2006 年在瑞士首次發表，其後每年發表一次。報告內指數涵蓋了全球 93%以上人口的 136 個國家，旨在研究資源和機會在各國男性和女性人口之間的分配狀況。報告主要對以下 4 個領域的性別差距進行衡量：經濟參與和機會——薪資、勞動參與度和高技能就業；教育——獲取基本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機會；政治賦權——在決策機制中的參與度；健康與生存——預期壽命和性別比率（WEF 2013, 3-4）。

[4] 女性勞動參與率最高的國家為馬拉威（女：85%，男：80%），到第四名國家坦桑尼亞開始女性勞動參與率低於男性（WEF 2013, 49）。即使在性別差距最小的冰島，女性的勞動參與率（81%）仍低於男性（86%），女男比例為 0.94（WEF 2013, 220）。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資料顯示，在臺灣，2012 年就業人口女男比例為 0.785（女性：43.99，男性：56.01）（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3a），勞動力參與率女男比例為 0.757（女性：50.64，男性：66.83）（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3b）。

[5] 調查的問題內容為：「在您的國家中，同樣的工作，女性與男性的薪資相同的程度為何？一分為完全不相同，七分為完全相同。」在這項指標中，得分最高的是馬來西亞（5.66）與菲律賓（5.64）。女性對男性的薪資比例皆為 0.81（WEF 2013, 50）。而在臺灣，非農部門女性與男性薪資比為 0.810（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3c）。

[6] 在「立法者、資深長官與管理者」指標，比例最高的是牙買加（女比男為 1.45），至第六名不丹（女比男為 0.97）開始，女性擔任高階官職的比例皆低於男性（WEF 2013, 52）。女性在國會所佔的比例也比男性低，在表現最好的國家——古巴中，女性所佔比例是 49%（WEF 2013, 60）。

女性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最著名的批評應該就是 Heidi Hartmann（1981）所指出的「性別盲」。她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類目（category）是沒有性別的，它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只為我們畫出了清楚的社會結構，但卻無法說明誰會填入結構的哪個位置之中。並且，她認為，既然馬克思主義所分析的資本，以及想要推翻的私有財產並不將女性作為女性進行壓迫，那麼這兩者的終結也不會為女性受壓迫的劇情寫下句點。即使如此，但她並不因此主張女性主義應該要拋棄馬克思主義，因為即使馬克思主義是性別盲，女性主義也有歷史盲的問題。兩者還是應該要合作，才能夠達到兩者分別追求的共同目標—人類解放。這種一方面保留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原本所提及的女性議題解決方法），另一方面又不放棄基進女性主義的關懷之女性主義者，大多被歸類為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7] 這派人士一方面探究馬克思主義之所以不能滿足女性議題討論之原因（如 Alison Jaggar、Iris Young 等人），另一方面也嘗試改造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使之適應女性議題的處理。

他們一方面和 Hartmann 一樣，認為馬克思主義有所謂的「性別盲」之問題，另一方面也同意不用因此就整個放棄馬克思主義。然而關於到底該如何改造馬克思主義來應用於女性議題的分析上，是存在許多分歧意見。首先，為了討論的必要，本文在此嘗試對女性議題提出一個概要性的定義。不同於基進女性主義把女性議定限定在生育與性勞動範圍內，就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看來，女性議題正是源於女性所擔任的「再生產」活動而產生，這是男性宰制女性的根源。根據 Jaggar（1983）與上野千鶴子（1997, 62）的整理，女性主義者所討論再生產的概念大概可以分成三類：人類生物學方面的再生產（基進女性主義所使用的概念，人生產出具體人）、生產體系本身的再生產（意識型態），與勞動力的再生產（這又可以分成「既存勞工的勞動力日常再生」與「透過生產與養育所產生的新興勞工」）。女性主義者把這三類概念當成一組概念來用，彼此之間有重疊的部份。而女性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於性別盲的原因，只注重對於「生產」活動的分析，對於女性所從事的「再生產」活動並不重視。

再生產的第一個概念是「人類生物學方面的再生產」，如 Firestone 與梅耶斯（Meillassoux）所主張的（上野 1997, 63），生育是人類這個物種的世代生產，女性與男性的關係決定了生育結果應如何分配。女性在這方面所擔任的生育工作

[7] 事實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之間也存有差異，本文所稱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指的是不認同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女性解放策略，但仍試圖使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來解釋女性處境並為之提供解放可能的女性主義者。

是由生理學所決定的，且是無法被改變的，生育功能造成女性被男性宰制的宿命。

第二個概念「生產體系本身的再生產」，是如阿圖塞所說的，資本主義體系維持自身運作所進行的再生產，它又可分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再生產，生產力的再生產又可分成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再生產（Althusser 1990, 151-52）。[8] 而勞動力的再生產的必要條件除了技能以外，還有對統治的意識型態服從。阿圖塞而言，家庭就是一種意識型態機器，對部份女性主義者，如 Barrett 而言也是如此（上野 1997, 62），宰制女性的父權體制就是在意識型態的領域內運作。對於這種把性別當作一種意識型態的看法，也有女性主義者提出反對。Delphy 認為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是有物質基礎的（上野 1997, 62-63），Delphy 的這個反對是無力的，因為阿圖塞本身就認為意識型態具有一種物質的存在（Althusser 1990, 184）。意識型態是真實歷史的反映（Althusser 1990, 179），它一方面展現了個人與他所處的生產關係之關係，另一方面它透過實踐行動在物質世界中展現自己的樣貌。[9] 它所呈現的並不是真實，而是個人與真實的關係。Jaggar 則指出，若把女性所涉及的生育勞動用這種概念來理解，那麼生育看來不是社會經濟基礎的一部份，而是被下層建築所決定的上層建築（Jaggar 1983, 156）。可是，生育的確為社會產出新的勞動力，因此，它同時又有第三種意義—勞動力的再生產。

「勞動力的再生產」就是家務勞動論戰所談的再生產，這是本文中女性主義者所使用的意義，這主要由消費與生育兩塊所構成。女性負責消費的大半責任，男性吃著女性準備的食物。另一方面女性負責生育的所有責任。從 Dalla Costa 與 James 的角度看來，這就是家庭主婦做的所有事，這類活動的特徵在於是在私領域中進行，也就是，未經由市場交換而提供的清潔、烹飪、生育、老幼病照顧，以及為勞工提供情緒上的撫慰等情緒勞動。阿圖塞認為勞動力得再生產透過工資獲得保證，但工資並不是勞動力實際再生產的條件。[10] 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只有

---

[8]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產資料的再生產這部份，阿圖塞提到一個資本家並不為自己的生產來生產，而是由別人為他生產出他的生產資料。如一個麵包店老闆並不為自己生產出麵粉、糖、酵母與烤箱，而是由其他人生產出這些生產資料。勞動力作為一種生產資料，也是在企業之外生產出來的。它與生產資料的再生產還是有所不同，如後所述。

[9] 如一個人認為他的觀念是 A，但他所做的行為不是 A，而是 B 或 C，那麼透過物質世界的行動可以知道他的觀念並不是 A，而是 B 或 C。舉例來說，A 認為自己是好人，且好人不應該偷竊，但 A 又偷竊別人的物品，那麼可以知道，他並沒有真實的認識自己。不是他其實認為偷竊並非一種不好的行為，要不然就是他其實不認為自己是好人。

[10] 工資本身並不能再生產出勞動力，它必須換成可食用的食物、足夠清潔的住所等等才能夠再生產出勞動力。而這個交換在現今社會中大多是在私領域之中進行，以家之名進行無關金錢的交換。

物質條件，它也是有技能的，並也包含勞動者對於秩序的順從態度。[11] 它並不在工廠內部（學徒制、生產過程內）進行，而是在生產外進行的。阿圖塞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學校與家庭擔任了這樣的功能。而 Jaggar 認為把生育用這樣的概念來理解，有助於瞭解女性勞動的經濟意義以及與經濟的交互關係（Jaggar 1983, 158）。舉例來說，貧窮與高出生率的關係：高出生率導致的眾多人口無法吃飽，於是造成貧窮的狀況；然而也因為沒有吃飽，沒有足夠品質的勞動力，所以需要生更多小孩以提供更多的勞動力。

從女性主義者對於「再生產」概念的使用可以看到他們在理論上面對一個兩難處境：一、若認為女性從事再生產勞動是生理學此一獨立因素所決定的，那麼就會有普遍化與本質主義的問題；若認為女性從事再生產是一種意識型態（上層建築），則它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體系，是由馬克思主義所解釋的物質基礎（經濟基礎）所決定的，那麼女性主義的主張的確可以收編至馬克思主義之中，也就沒有女性主義此一獨立理論體系發展與存在之必要。二、若認為的確有一獨立體制使得女性受到壓迫，那麼女性主義要回答的是，這個體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什麼？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一方面基於認同於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所以想避開第一種困難，一方面又基於基進女性主義對於女性處境的洞見而不接受第二種結果，這導致了他們必須面對第三種後果所帶來的問題，也就是 Young（1981）所指出的 Hartmann 的問題。

Young 認為 Hartmann 一方面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認為有「父權體制」這個獨立的體系在性別之間運作，這樣的雙體系論預設了兩個不同，且彼此斷裂的領域。這種理論的優點是可以避免「究竟是階級或性別是比較基本的壓迫根源？」之問題，可是在這種理論之下，「家」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主要場所，如此一來，很難把對女性在家受到的壓迫之分析帶到家之外的領域，而馬克思主義還是可以維持它的性別盲，繼續它關於生產關係的理論，女性壓迫問題對人類解放來說仍然是一個附加的問題。這樣的雙體系論基於實務理由而發展出來的，但這不代表就只能停留在這個層次上。於是 Young 提出「性別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作為新的分析框架，認為性別是分工的首要形式，透過分工可以討論具體的權力關係，誰下命令、誰服從，與誰納涼、誰做苦差事。她認為透過性別分工的分析，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可以解釋帶有性別偏見的資本主義為何物。然而 Young 的這種主張有一些問題：一、如 Rosemarie Tong 指出，即使使用分工

[11] 這一部份又與意識型態有關，也是勞動力的再生產與生產資料再生產的不同之處。

概念可以討論到階級所不能討論的「誰填入哪個位置」，但這並不代表資本主義就與父權體制相扣，兩者的關係可能只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是可以用女性主義的分工論來補充（Tong 1996, 323）。如此 Young 則又回到了她自己所反對的——女性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一種附加物。二、即使 Young 所主張的「性別分工」可以解釋女性在家庭與家庭之外的壓迫，但是否能解釋男性受到的壓迫與行使的宰制？它是否可以回答公私領域的產生？又為何會從「性別分工」到「分工」？若性別如此重要，為什麼我們早先無法看到？

與 Young 一樣，Jaggar（1983）也有注意到雙體系論的問題，於是她認為女性主義有必要發展出一個統整的概念框架來解釋複雜的社會現實。像是傳統馬克思主義一樣指認出不同的生產模式之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也應發展出一套方法以指認出男性對女性宰制的不同發展階段。Jaggar 選擇了不同於 Young 的另一條路，她沿著 Hartmann 對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進一步從馬克思主義對人性本質的看法與政治學特色來證成馬克思主義對於處理女性議題來說是不夠的，為了要把女性議題整合至馬克思主義的討論之中又不失女性主義的獨立性，她選擇的是利用「異化」這個概念說明過去被排除在馬克思主義討論之外的女性其實也如工人一樣被異化，但她們與工人被異化的成因不同，以維持女性主義的獨立性。Jaggar 之所以選擇使用「異化」作為新的核心概念是因為她認為異化是資本主義下關係之品質與結構的特色，且（也許可以說是依著 Dalla Costa 與 James 的路子）她指出既然家庭主婦被排除在資本主義生產外（家庭主婦沒有為在市場賣出商品而有薪水，以及沒有利潤是源自於她們的勞動），那麼她們與她們家庭裡其他成員的關係、與其他家庭主婦、與自然，以及與自己的關係就不會是異化關係。於是她企圖利用證成家庭主婦、女性也是有異化的，於是她們在資本主義之下也是受到壓迫的，把家庭主婦納入社會革命之中。然而 Jaggar 這種作法也有問題：一、理論上的問題。和 Young 一樣，Jaggar 這種作法最多只能說馬克思的概念的確可以使用在分析女性處境上，Jaggar 所做的只是補足了馬克思因性別盲所沒有做的分析，再一次的，女性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附加物。二、邏輯上的問題。Jaggar 的論證之前提為「若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那麼則有異化」，這一前提本身就不正確了，異化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中也存在。再來即使前提正確，說明女性的確有異化以證成她受到資本主義式的壓迫有有邏輯上的謬誤。

Young 與 Jaggar 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式改造有共同的問題。第一、如前所述，兩者成功地成為她們所反對的那種「馬克思主義的附加物」。第二，即使她們新瓶裝舊酒的概念正確地說明瞭女性的處境，但兩者皆還停留在阿圖塞

所說的描述性理論層次，這是發展理論的必要經過，但理論最終是要發展出超越「描述性」的形式。若滿足於描述性理論的內容有多麼符合現實，那麼反而會阻擋理論的發展，無法看到「運作機制」為何（Althusser 1990, 160）。Jaggar 自己也認為「新的理論框架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的異化，但也*必須要超越它*才行。」（Jaggar 1983, 317，斜體為本文所加）然而，要怎麼超越馬克思主義，Jaggar 也沒有說清楚。當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看似走到死胡同時，同樣是女性主義者的 Luce Irigaray（2005）似乎為他們開闢了一條新路。不同於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Irigaray 對於馬克思的理論並沒有太多的分析，她並不執著於使用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所以她並非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而是企圖直接挑戰馬克思的《資本論》。Irigaray 的超越在於，她選擇挑戰《資本論》這意味著她認為《資本論》是重要的著作，但另一方面基於她精神分析的途徑，她又不會受制於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她完全不認為馬克思有「性別盲」，而是完全沉浸在「男性中心」思想而不自知。也就是說，因為她並沒有像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一樣，一方面肯認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又否認馬克思主義，她完全是以懷疑的眼光看著《資本論》。於是她並不會遇到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的兩難問題。在她完全超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但又不是完全無關的分析中，我們反而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關於女性議題的新可能。然而也因為 Irigaray 精神分析學派的背景，她對於《資本論》的批評若從馬克思主義的眼中看來是顯得沒有「基礎」，於是她所開創的「新可能」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式再梳理一遍。

透過 Irigaray 的洞見，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並不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所認為的「性別盲」，而是他無意識的「男性中心」思想。如阿圖塞所說的，每一種意識型態都有它的物質基礎，在論文的最後一部份，首先要做的是，利用 Irigaray 帶來的新可能，來檢視馬克思的「男性中心」思想之歷史條件為何？在說明這個歷史條件的過程中可以發現，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的理論困境實則因於他們本身「女性中心」思想。在「反對」父權體制的同時，他們其實已經預設了父權體制「女性與再生產有關」的這種意識型態之有效性。不管是馬克思的男性中心思想，或是女性主義的女性中心思想，這兩者都是沿著性別此一軸線所發展出來的。透過結合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洞見，我們得以超越性別意識型態，而看到更純粹的理論。不管是「資本家壓迫工人」或是「男性壓迫女性」，內容可以隨意置換，但「壓迫」此一形式不變。透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於商品的分析，我們能夠看見，這樣的形式其實根源於拜物。然而馬克思的研究只說明了人生產出物這種勞動，透過女性主義的發展，我們得以關注到人生產出人這種

勞動，而透過本文的研究可以發現這種勞動也被拜物為女體。這兩種勞動造成了馬克思所看到的資本主義與女性主義者所看到的父權體制，因為這兩種勞動，讓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看來陷入理論的困境。透過說明這些問題的根源，我們也才有可能真正的解決問題。

本文將會從較為具體的家務勞動有給制的討論開始，再往較抽象的理論問題探索，如 Hartmann 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以及 Jaggar 從人類本質跟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對於女性處境的不足之處。雖然馬克思主義有這些問題，但是部份女性主義者依然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是有助於分析及解決當代女性問題的，像是 Jaggar 使用異化來連結在家做家務勞動的女性與在家之外從事薪資勞動的人，也有如 Young 使用性別分工來分析男女處境以統合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這兩大變數。即使他們這樣的使用方式是成功的，其實是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範圍，但是和他們所主張的女性問題的獨立性，其實又有衝突。在此本文將借用另一種使用馬克思主義的途徑來解決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理論問題，也就是 Irigaray 使用資本論中對於商品的分析來用來女性身上。透過這些嘗試可以看到即使馬克思主義有性別盲的問題，但這並不妨礙它被用來分析女性問題。接下來進一步探討，為什麼馬克思並沒有看到女性主義所說的那些問題，回答這個提問，要用公民象徵的普遍性來理解。在解開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又可以發現，女性主義其實也有著把再生產拜物為女體的傾向。在看清楚這兩點之後，可以發現，其實人同時擁有生產與再生產這兩種勞動，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分別是這兩種能力拜物發展而出的。瞭解到這種意識型態之後，才有可能回歸真實。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第二章　女性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

女性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有全面性的批評始於 Dalla Costa 與 James 的文章，她們認為過去傳統馬克思主義對於女性議題的討論方向是錯誤的，因而馬克思主義對女性問題的策略也是無效的，然而女性作為一部份的人類，一個宣稱可以解放全人類的主張無法解決她們的問題，那麼這個主張也就是無效的。她們認為過去被社會革命所忽略的「家庭主婦」正是社會革命所缺乏的力量來源。而她們所建議的，家庭主婦革命方式就是爭取「家務勞動有給」，她們相信此舉將能終結家庭主婦（於是也將導致所有女性）的壓迫與從屬地位。Dalla Costa 與 James 的主張引發了馬克思主義者與女性主義者之間針對階級與性別的優先性進行討論，加上 1970 年代在美國新左派運動中女性主義者與左派人士的爭議，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益發緊繃。在這樣的發展下，Hartmann 在“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一文中為兩者的關係定調，她指出表面上看來是兩個主義的合作，但實際上是把女性主義消融至馬克思主義中。她認為馬克思主義對於女性解放的策略錯誤，其根本並不是因為討論方向的問題，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有「性別盲」，導致它從未把女性的壓迫視為「女性的」壓迫來分析處理，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從未回應過「女性主義問題（feminist question）」，而是把女性放入經濟系統之中來分析「女性問題（women question）」。Hartmann 主張女性的壓迫有它的獨立性，是由「父權體制（patriarchy）」所主宰的，而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兩者互相強化彼此，她舉了「家庭薪資（family wage）」為例來說明這樣的關係。「馬克思主義有性別盲」的這個說法普遍受到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的支持，也成為女性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批評。延續這種從理論角度出發的批判，Jaggar 進一步地從人性本質以及政治學的概念來分析馬克思主義，探究為何馬克思主義對於女性主義來說是不足夠的。以下將會分別介紹這三種批評的內容，並小結這些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是否無誤。

## 第一節　Dalla Costa 與 James 的家務有給之討論

Dalla Costa 與 James 的文章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是首篇女性主義者有別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女性解放策略所提出新的革命策略。文中透過探討女性身為「生產者」的角色，指出女性即使從事著非薪資勞動的家務勞動，但也受到剝削。兩位作者認為女性的這種剝

削因為沒有工資而被遮蔽，也無法意識到自己也是階級的一部份，因而主張家務勞動有給。這篇文章有理論上與歷史上的重要性，在討論到家務勞動，以及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關係的文章常會出現關於此文的討論，然而每個作者對於這篇文章的摘述不一（Tong 1996; 上野 1997; Hartmann 1981; Jaggar 1983），此文也尚未有完整的中文版本，因此本節先回到文章本身，完整地說明 Dalla Costa 與 James 此篇文章的內容，再介紹對此的反對意見有哪些，最後分析此篇文章與反對意見又各有什麼問題。

一、"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Dalla Costa 與 James 在本文中指出，要瞭解當今女性問題要從家庭主婦瞭解起。兩位作者認為，「女性問題」與整個「女性角色」有關，而女性角色是由資本主義下的勞動分工所創造出來的，家庭主婦則是這個角色的核心形象。不管女性是在家或是在外工作，不管她們的階級為何，她的地位是由家務勞動所決定的。而兩位作者在這篇文章中會鎖定工人階級的家庭主婦做分析，不是因為只有她們被剝削，而是因為認為這些家庭主婦對資本主義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她們是所有其他女性地位的決定因素。若把家庭主婦當成研究核心，那麼就要瞭解現代家庭與「家庭主婦」是如何被資本主義創造出來。在資本主義之前女性也是受到壓迫，但兩位作者認為，資本主義開始把女性作為女性強烈地剝削，但同時也具有終極解放女性的可能性。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家與家族是生產的中心，女性、小孩與年長者為家庭提供了勞力，這被視為是社會的與必須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廠是生產中心。在工廠工作的人可以領到薪水，被工廠排除在外的人則否。資本摧毀了家庭與社群和生產的一體性，把男性變成了「薪資勞動者」，把經濟責任全部交給男人擔。從這時開始了一種排除過程，那些不能生育出與服務工資勞動者的人被從家驅逐。第一個被排除在家之外的，在男人之後的，是小孩，他們被送到學校去。在這狀況下，家庭不再是生產與教育的中心，女性勞動者被留在家中，而資本主義不只對女性進行這樣的排除動作，它把小孩送進學校，同時也更強化了女性在家中的孤立。

女性被資本主義孤立在家中，從事沒有工資的個人服務，她的勞動產物（也就是「勞動力」）是隱形的，她受到剝削但因為沒有工資而未能被看見。兩位作者認為，家務的高度機械化並沒有為家庭主婦多帶來

一秒的自由時間，它只是讓家庭主婦在家中與冰冷的機器同存。家庭主婦永遠在值班，因為製造與照料小孩的機器並不存在。可以利用機器的只有那些與特殊服務（specific service）有關的家務，像是烹飪、洗衣與清掃。她的工作日是永無止盡的，這並不是因為她沒有機器，而是因為她是被孤立的。且家庭主婦因為被留在家中所以機會較少，此又被用來證成她的確缺少出外的能力，強化了這個社會與女性本身認為「女性是沒有能力的（incapacity）」這個迷思。這種迷思同時也遮掩了兩個事實：第一，工人階級之所以能組織那些鬥爭，基礎是在於有著從未停止的女性非正式組織；第二，在直接生產循環的鬥爭中，女性的支持與組織，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都是具決定性的（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5, 29）。資本建立了核心家庭並利用它讓女性從屬於男性。女性作為一個不直接參與社會生產的個人，也不能獨立的在勞動市場中現身，這切斷了她創造力以及工作活動的可能性，於是這也切斷了女性之性、心理與情緒自主性的表達。而在生理方面，女性的子宮被用來生產資本主義所需的勞動力而被監控著，子宮不屬於她自己，身體的整全性不再，資本透過這種女性的破碎化來建造女性角色。兩位作者認為，在創建出這種女性角色的同時，資本也創造了由男性作為工資勞工並且為家長的異性戀家庭，這是「女性剝削」這種特別剝削所特有的手段。在資本主義下，異性戀被視為一種正確信仰，因為如此才有資本主義所需的勞動力產生。

兩位作者指出，正統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並沒有看出女性在社會組織生產循環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認為女性是在生產循環之外，她在本質上是在家庭範圍內提供一系列的使用價值。兩位作者並提到馬克思曾說過他觀察到在工廠的女工人所發生的事，認為她們待在家裡對她們會比較好，那裡有著較高道德形式的生活。但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家庭主婦的本質並未清楚的討論過。兩位作者想要澄清的是，在工資之中，家務勞動生產不只是使用價值，本質上也是剩餘價值的生產（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5, 32）。[12] 女性作為社會生產力來源之提供者，卻被視作是從屬的人格。兩位作者接著從三個角度更仔細探討女性角色是如何創造出剩餘價值的：1.無薪奴隸的生產性；2.消

[12] 在文章註 12 中，作者說明她們的意思是：家務勞動作為一種工作，在馬克思的意義下是生產的，也就是，生產出剩餘價值的（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5, 53）。

極性的生產性；3.紀律的生產性。

1. 無薪奴隸的生產性

常有人認為女性在家戶中的勞動是不具生產性的，但兩位作者並不如此認為，她們認為家務勞動是一種社會服務，它是為勞動力的再生產所服務，而資本主義從家庭的這種功能中解放了男性，使他是完全自由於是可以「直接的」剝削。同時男性也成為了有薪奴隸，以賺得足夠的的薪資，讓女性再生產出他的勞動力。這成功的把家務勞動分派給女性，同樣地也控制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在限階段，資本依然偏好引進勞動力(外勞)但同時把女人留在家中。

兩位作者質疑在現實中各個政黨為何對家庭主婦所提出的政策是進行補貼而不是提供工資，她們認為補貼只會把婦女制度化為家庭主婦。但兩位作者也說她們並不相信解放可透過工作來達成。工作就是工作，不管它是在家之外或之內。工資賺取者的獨立只意味著為了而資本成為自由的個體（free individual），不論個體是男是女。那些提倡女工的解放的人有賴於「有在家之外的工作」此一前提，而這是問題的一部份，並不是解決方案的一部份。成為資本的奴隸並不是從家奴的解放。否認這件事同時也就否認了資本奴隸這件事，這再一次證明瞭如果不瞭解女性是如何的被剝削，你不可能真的知道男性是如何被剝削的（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5, 35）。

透過未償付的工資形式，當我們在一個資本主義式組織起來的世界中生產，老闆的形象是隱藏在丈夫之後的。

> 「即使太太如他一樣在外工作同時回家，先生傾向於讀他的報紙，等他的晚餐準備好。這種特別形式的剝削表現了家務勞動需要一個相符的(corresponding)、特別形式的鬥爭，也就是女性的鬥爭，*在家庭中的*。」（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5, 35 斜體為原文所加）

如果我們沒有把握住這種家庭正是資本主義的支柱，若我們把它誤解為只是上層結構，依賴於工廠的鬥爭才能改變，那無力的革命會永恆存在，並且加重矛盾對立，這將有助於資本主義發展。我們可

能會永遠有這樣的錯誤，認為家庭主婦只生產出使用價值（as producers of use values only），認為家庭主婦是外在於工人階級。只要家庭主婦被認為是在工人階級之外，階級鬥爭就是被阻止的，遭受挫敗的，並且不可能為它的行動找到全景。

揭露家務勞動是生產力的一種面紗形式，將會掀起一系列關於女性鬥爭之目標與形式的問題，這個鬥爭就是「給我們做家事的薪水」。兩位作者在註中提到「家務勞動有給制只是一個基礎，它的特點是本質上直接把女性受迫、從屬與孤立與它的物質基礎連結起來，這基礎是女性剝削。」（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5, 54）她們並認為「鬥爭為女性在家務勞動之外提供了另一種身份的選擇方案。在社會鬥爭之中女性可以探索並執行她們的力量。」（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5, 37）而透過這個鬥爭將可以與其他女性一起，不僅是朋友或鄰居，而是工作同事，摧毀家庭主婦這個角色，這能打破被私有化的女性，把女性團結起來，並重新整合至社會中，不是依賴者而是有自主性的。兩位作者主張女性要拒絕從事作為女性工作的家務勞動，這使得女性在每個場合之中都以個體的方式與男性相對著，而不是夫婦關係、子女關係，因為資本主義組織的每一個領域都預設了家的存在。這提供了在外爆炸這家中的矛盾與挫敗，而不是如資本主義所希望的，是在家中內爆。

2. 消極的生產性

女性在家中的第二個角色是消極被動的，她一方面承擔男性在外的壓力，或因男性在資本主義組織工作而受到的權力宰制，女性成為男性滿足對權力的渴望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女性是生產的，因為她是一個社會壓力的安全閥。另一方面，女性的個人需求被完全否認，她被迫要把她的挫敗昇華至一系列以家庭為主的需求。

3. 紀律的生產性

女性在家中的角色的第三個面向是，壓抑的形象、對家裡所有成員在意識型態與心理層面上執行紀律。女性，負責再生產出勞動力：一方面管教小孩，也就是未來的勞動力，另一方面管教她們的先生，也就是今日的勞動力，只為使用他的工資以再生產出勞動力。

Dalla Costa 與 James 認為，家庭主婦與其他人分隔開來，各自被鎖在自己家中，就像蠶在繭中，為自己的工作囚禁著，為資本主義生產出絲線。要拒絕這一切，家庭主婦必須要認知到他們自己也是階級的一部份，只因為她們沒有被支付工資，所以是等級最低的。家庭主婦在整個女性鬥爭中有關鍵性的作用，因為她能減少對資本主義工作組織，也就是家庭，的支持。此外，家庭主婦這種隱藏在社會勞動後的角色必須要被摧毀。女性是沒有能力的這種迷思，是根植於被孤立的女性依賴著其他人的工資於是由其他人的意識所形塑著這件事。這個迷思只要一個行動就被打破了：女性有她自己的工資，打破個人經濟依賴的基礎，讓她在家之外的世界有獨立的經驗，在社會結構中，不管是工廠或辦公室，展現社會勞動，開始她自己對傳統階級形式有的社會反叛形式。

二、反對意見

針對 Dalla Costa 的主張，女性主義者支持者少，反對者眾。Hartmann 認為 Dalla Costa 與 James 增加了我們對於家務勞動的理解，瞭解到家務勞動的社會本質，這點是有貢獻的。但她們並未把焦點放在女性主義上，要不然她們應該會把重點放在女性從事家務勞動對於穩固男性優越的重要性，是維持父權體制的關鍵，而不是強調家務勞動與資本的關係。她們沒有看到女性目前在勞動力市場的處境，而用「女性的壓迫是另一種階級壓迫的方式」來理解女性處境。她們被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力給吸引，但也被馬克思主義宰制了他們的女性主義（Hartmann 1981, 8）。另外，Bergmann 指出即使執行了家務勞動有給制，可能的方案有二：一是國家對已婚男性徵特別稅，再將稅收轉發給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如此一來無異於只是挖東牆補西牆，對於整個家庭的收入並沒有幫助。其二是對所有納稅人徵收一筆稅收再分配給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然而這樣會加重單身者或是雙薪家庭的負擔，並不公平（Tong 1996, 93）。再者如 Jaggar 認為，家務勞動有給制的主張雖然可以確保女性在經濟上獨立於男性，肯認女性所擔任的工作之價值，可是就她看來，一方面，對家務勞動償付工資不太足以提升它的地位，這也不會減少女性在家中的孤立。另一方面，即使這個主意對女性解放有貢獻，家務勞動有給制以長期看來與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目標是不相容的。因為它會加強女性主義者所拒絕的性別分工，並會擴展社會主義者想要丟棄的資本主義式的

剝削（Jaggar 1983, 329）。再者，若家務計酬，那麼會助長資本主義「把一切事物均加以商品化」的傾向（Tong 1996, 94），而主要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也會更無動機以及機會離開私領域進入公領域，增加女性勞動力整合進社會的難度，這應非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所期待看到的狀況。

家務勞動論戰似乎隨著越來越多女性投身勞動力市場，越來越少有純粹的家務勞動者，而趨於熄火狀態。然而這不代表此一論戰在理論上就失去意義。如 Delphy 就將家務勞動視為女性主義頭號政治性、理論性課題。她提出家內勞動與家事勞動的區別，家內勞動是在 domus（家內）進行的無償勞動，家事勞動則是家內勞動的特定事項。前近代的生產過程大多是在家內進行，很難區分出生產與消費的區別。生產與消費的勞動區分是因市場才有的。她問的是，家事勞動為什麼會是無償勞動，是因為家事勞動從市場被排除。是因為被市場排除所以是無償勞動，而非因為是無償勞動所以被市場排除。對於這樣的情況，要問的是「市場是以什麼樣的條件，將家事勞動放逐到市場之外的。」（上野 1997, 35）

三、小結

不論是家務勞動有給制的正方或反方，可以看出，他們都將家務勞動視為一個「女性」問題，也就是將再生產當成只有女性的事。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家務勞動完全沒有被計價的困難，否則，清潔人員、打掃工，與洗衣店員的工資又是如何被計算、償付的？家務勞動論戰反應了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理論有未解的問題，家務勞動沒有薪資的原因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以有更完整的解釋。

## 第二節　Hartmann 所指出的，馬克思的性別盲

馬克思主義對家庭領域的運作視而不見，對女性的受迫處境無法提出讓女性主義者滿意的回應。基於這樣的情況，女性主義者開始對馬克思主義，以及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提出批評，如 Hartmann 在“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一文開頭即精確的點出了女性主義過去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婚姻，就像英國民法中所闡釋的夫婦婚姻一樣：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是同一個，而這同一個是馬克思主義。（Marxism and feminism are one, and that one is Marxism.）」

（Hartmann 1981, 2）

就 Hartmann 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者，不管是前期或晚期，都是性別盲（sex-blind）。他們從來就沒有回應過女性主義問題（feminist question），而是把女性放入經濟系統之中來分析女性問題（women question），把女性的壓迫與生產（production）問題做連結，將女性視做工人階級的一部份（而不是視為女性本身）。女性與男性的關係被歸入在工人與資本家關係之下。前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恩格斯）認為女性遭受壓迫是因資本主義與私有財產所導致的，正如同工人受到普遍的剝削是因為資本。若女性與男性有同樣的工資，那麼就能在經濟上獨立，在同等的根基上與男性一起對抗資本主義。然而，Hartmann 認為，既然資本主義並沒有把女性以「女性」的方式（而是以工人的方式）進行壓迫，「那麼資本主義的終結更不用說能導致女性壓迫的終結。」（Hartmann 1981, 5）

至於近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女性問題的分析，Hartmann 則以 Zaretsky 為例。在《社會主義革命》一書中，Zaretsky 認為性別歧視並非是由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現象，但是的確是由它形塑出來的。他認為資本主義的問題在於切割了工資工作與家庭工作。女性負責在家工作，以幫資本主義再生產（reproduction）出工人的勞動力。女性因為從工資工作中被排除，所以更加的受到壓迫。如果說男性是因為有工資工作而受到壓迫，那麼女性則是因為不被允許從事工資工作而受到壓迫。對 Zaretsky 而言，男女之間的差別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對公私領域的劃分，女性為男性做事只是表面上看來如此，女性與男性其實都是在為資本主義工作。只要消滅資本主義就能取消公私二分，也就不會有性別歧視的問題。Hartmann 認為 Zaretsky 只回答問題了一半，他並沒有解釋為何女性會在家工作，而男性則投入勞動力市場。Hartmann 認為公私二分的真正問題是把男性劃分至較優越的位置，而將女性放入從屬的位置。

儘管馬克思主義者的回應無法滿足 Hartmann 所認為的女性主義問題，Hartmann 仍然嘗試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從物質基礎上來分析父權體制。她認為雖然男性在父權體制中因不同的階級、種族或族裔而有不同的位置，但因為他們都控制著他們的女人，所以成為一個群體。他們依賴著彼此以維持這種宰制關係（Hartmann 1981, 15）。Hartmann 認為，父權體制的物質基礎就在於男性透過排除女性獲得基本工資工作與限制她們的性來

對女性進行勞動力的控制。而異性戀單偶制的關係正是控制這兩個領域最有效的制度，它讓男性得以滿足許多私人或是性的需求，以及撫養小孩的需求，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因此有利益上的衝突。「父權體制一方面需要資本主義的公私劃分將女性留在家裡，為男性服務，另一方面資本家則想要女性（除了他們的女人外）投入勞動力市場。」（Hartmann 1981, 19）Hartmann 指出，在這樣的衝突之下，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是會相互調整的，如在 19 世紀末發展出的「家庭薪資」（family wages），就是在計算男性工資時是以他背後所需要支付的家庭費用為標準，如此男性有較高的工資，而讓女性傾向待在家裡處理家務，同時女性的家務責任也加深了她們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弱勢地位。小孩與雙親之間的關係轉變則可視為父權體制因資本主義而有的調整。當小孩被排除在勞動力市場之外，父親對於孩童發展的重要性就不如以往，而由母親擔任起這個角色。「當小孩是具有生產力的時候，男性宣稱小孩是他們的；而當小孩變得沒有生產力的時候，他們就被交給女性。」（Hartmann 1981, 23）

Hartmann 認為父權體制透過建立了階層關係而強化了資本家的控制，而資本主義的價值則形塑了父權體制下「好的」的定義。若我們檢視一下基進女性主義者對於男性特質的描述：競爭性的、理性主義的、支配的，我們可以發現這幾乎就是在描述資本主義社會。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交織關係也表現在對勞動力的性別分別，女性從事較低工資的工作，而且是那些被認為是比較適合她們從事的工作，如清潔打掃、照顧。只要一份工作會因為是女性擔任的而被貶抑，那麼資本主義中對交換價值優先於對使用價值的需求這個衝突就可以被避免（Hartmann 1981, 29）。從這個角度來看，會得到不同於社會主義者的結論——並不是「解決階級問題就能解決女性問題」，而是「要先解決女性主義的問題（feminist question），才有可能解決階級問題。」

儘管 Hartmann 批評了馬克思主義者是性別盲，並沒有將女性視為「女性」來分析她們所遭遇的問題，但 Hartmann 本身也沒有回答「為何是男性宰制女性？」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她並沒有回答何以男性可以「透過排除女性獲得基本工資工作與限制她們的性來對女性進行勞動力的控制」？這樣的說法還不夠唯物，或說，還不夠物質「基礎」。另外，她也沒有回答，為什麼女性被歸在私領域，而男性被歸在公領域？強調女性與男性的不同很容易強化了「區分」的作用力，而 Hartmann 並沒有說明「不同」何以產生「高下」，以及，「分工」如何產生「壓迫」。此外，Hartmann 的看法也有點循環

論證的味道，女性受到壓迫是因為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交互作用，而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則又透過壓迫女性來維持。女性因為父權體制而要負責家務工作，在資本主義中，又因為她要負責家庭工作而較無勞動力，因此獲得較低工資，而讓她傾向待在家裡從事家務工作。

雖然如此，但不能說她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也就是「性別盲」，是沒有效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類別的確是不分男女，對於現今有的性別現象，光憑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不足以解釋周全的。

### 第三節　Jaggar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評

Jaggar 在《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一書中使用人性本質與政治學概念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及和其相關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基進女性主義進行評價，以證成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是女性追求解放的最佳提案。她之所以使用人性本質與政治學概念這兩個角度切入乃是因為她認為當代女性主義者繼承了傳統女性主義者對於自由、正義與平等概念的挑戰，而這三個概念正好是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因此，女性解放與政治哲學是相連的。此外，一個政治理論關於人性本質的觀念是它的哲學基礎，對於人性本質的信念會影響我們對於社會現實的概念化（Jaggar 1983, 9）。基於這兩個原因，Jaggar 從這兩個角度解讀馬克思主義，由此指出馬克思主義對於女性解放之不足，以下分點述之。

一、馬克思主義的人性本質之概念

就 Jaggar 看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本質的特點有三個：「實踐（praxis）」、由生產方式決定的理性，以及對異化的觀察。她認為馬克思對於人性本質的理解並非強調純粹理性的部份，他認為人類是一種生理物種，所以人類一定（而並非恰好）有著特定的生理構造，也因為人類就是一種生理物種，因此他並非獨立的個人，而是群體，也就是社會。人若要在他既存的生理構造中生存下去，就必須要從自然界（也就是非人類的世界）中獲得資源，進行改造來滿足自己的需求以生存下去。而人與其他物種的不同之處在於，人並不單單接受這個世界所提供的資源，他會在「腦袋中」使用並轉化這些資源。即使蜜蜂可以建構出結構完整的蜂窩，也可以把花蜜變成蜂蜜，但人類與蜜蜂的不同之處在於人類「在

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Marx 1972D, 202）此外，人類活動是有目的的，馬克思稱此為「實踐（praxis）」。

實踐是人類有意識地轉化物質世界以滿足需求的身體勞動，這是比純粹理性更為本質的活動。「實踐」與其他動物的行動不同之處也在於，它是一種社會活動。若一個人獨自存活，他並沒有累積並傳承他的經驗，他的生存是孤立的，而不是群體的，於是他並不是作為「人類」這個物種。人類實踐一定是與合作有關的，於是也就會和分工有關係。與其他人合作分工需要溝通，於是有語言，而語言同時也讓個人的經驗得以累積並傳承下去。最初的實踐是直接滿足人類生理需求的行為，而在滿足第一個需求（生理上的需求）的同時也會創造出新的需求。就這個意義上，人在滿足需求的過程中，不只改變了自然界，同時也改變了自己。而這個過程會一直發展到人性本質完全地被轉型。

有趣的是，一般強調人的生理基礎的理論是要主張人基於生理衝動等結構上的限制，於是有著受限的可能性。但透過理解到「滿足需求的同時創造出新的需求」，馬克思的理論雖然同樣基於人的生理結構，但他看到人同時有開創自己的無限可能。他並不認為人的生理結構會決定了他的本質，人的生理結構如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一樣，於是如同所有自然界的資源一樣，可透過勞動進行改造的。生理結構與人的關係並非是限定的，而是辯證的。Jaggar 以手為例，人使用兩足行走，讓手空出來可以使用工具，這也讓人更加使用兩足行走並發展工具。由此例可以看到，實踐（發展工具）受到生理結構的限定，然而實踐會採取什麼形式（斧頭或杵臼）則是與社會中成員如何組織他們的生產活動有關。人在社會中的位置也會影響到他們的生理狀況，如在馬克思那個時代的勞動條件下，資本家比較健康，工人比較短命（Jaggar 1983, 55-56）。

馬克思對於人類本質的另一獨具看法和理性有關。與自由主義者不同，馬克思認為理性並非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性標準，理性是要透過行動表達的，因此它會受到行動所在的社會所限定，什麼是理性的行為也是由所在的社會來定義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追求利潤被認為是理性的，競爭行為是理性的，人的自我主義（egoism）是可欲的。基於資源稀有加上私有財產，每個人對自己使用的東西有排他性，人與人之間看起來不再是一個物種群體，而是彼此相對的個人，互相競爭著資源的使

用。，在這樣的情況下，分享被認為是一種不理性的行為，人在其中經驗著自己與他人的強取豪奪，並也更加肯認了自己與他人「就是」強取豪奪。

最後一個 Jaggar 所認為的，馬克思特別的人類本質概念是「異化（alienation）」。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使用異化來描繪人類本質在資本主義下的特殊表現形式（manifestation），從人文關懷角度出發的馬克思詮釋者認為異化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基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組織的形式遮蔽了社會成員彼此是相互依賴的這個事實，每個人彼此競爭著稀有的資源，視自己為孤立的個人。人類異化只能透過廢除資本主義社會才能超越，在新的社會中，生產工具不再被私個人（private individuals）擁有與控制，生產工具社會化，從而歸屬於整體的一個社會（Jaggar 1983, 58）。工人的勞動不再是被用來追求利潤或是償付帳單，人的利益並不來自於商品的消費。勞動不再是一種強迫的活動，而是人類實現自我的管道。

然而，馬克思主義對於女性的人類本質有些許不同的看法。對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社會是由一條橫跨所有人的特殊屬性的線（也就是階級，於是也包含了 Hartmann 所說的性別盲）所劃分的社會，他本人並沒對資本主義下的女性有過什麼研究，這件事是由恩格斯（1972）來完成的。恩格斯在《家庭、國家與私有制的起源》一書中討論了資本主義下的性別分工，以及討論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女性處境。他認為女性的從屬地位是一種壓迫形式，它是由階級社會的制度所造成的，也因為女性的從屬地位為資本主義的維持提供的利益，所以存在至今。

在早期的分工中，性別分工是最原初的，也是一種「自然的」分工，男性生產出物質工具，而女性在家戶中工作。恩格斯認為，在這個時期，女性並不從屬於男性，因為每個性別有它主宰的領域，而兩種領域都是維生所必需的，於是在兩種領域進行勞動的人有著平等地位。女性的從屬地位來自於男性所主宰的生產領域之發展。生產力發達，剩餘價值被創造出來，於是開始有可累積的財富。在此，一方面，勞動力為財富的來源，另一方面，累積的財富也可傳遞給下一代，基於此時生理結構上的限制，人可以明確知道小孩的母親是誰，卻無法確知小孩的父親是誰，於是女性的生育能力被男性給控制。

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一方面認為人類本質並無性別之分，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基於性別的分工是「自然的」。可是，從馬克思本身的觀念中，我們可以看到性別的作用，對他而言，女性與男性仍然有「性質」上的差異。如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道：

> 「如果限制婦女勞動指的是勞動日的長短和工間休息等等，那末勞動日的正常化就應當已經包括了這個問題；否則，限制婦女勞動只能意味著在那些對婦女身體特別有害或者對女性不道德的勞動部門中禁止婦女勞動。如果指的就是這點，那就應當加以說明。」（Marx 1972C, 34）

這段話若從現在的角度看來，可以質問的是，若對身體的的傷害與道德問題可以作為禁止特定人士進入特定勞動部門，那麼，對婦女身體特別有害，何以對於男性就不會造成傷害？對女性不道德，何以對男性就不是不道德的？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性別分工是他們革命的底限，但女性主義者並不僅於此。她們認為既然性別分工是所有分工的基本，那麼若不把性別給消除掉，社會分工就無法真正地被消除。馬克思又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中寫道:「男性對女性的關係是最自然的人對人的關係。」（轉引自 Jaggar 1983, 69）當男性與女性真正地都是「人」，那麼，（男）人與（女）人的關係才會是真正地人與人的關係。

二、馬克思主義人類本質概念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中，人類本質是透過實踐表達，然而，以恩格斯所說的，實踐是在男性所主宰的生產領域中進行。在這領域中人使用自然界的資源並轉化，以滿足他的需求，並同時創造出新的需求。恩格斯認為女性的從屬地位是源於男性所主宰的生產領域之發達，但若從實踐的角度看來，無法實踐的女性可說是不充份的人，男性才有機會發展成完整的人。實踐這個看來是性別中立的概念，因為領域的分立加上馬克思與恩格斯本身的限制而有了性別偏差。再來，男性所主宰的生產領域與女性所主宰的再生產[13] 領域之不同，並不在於勞動過程所發生的場域（雖然之後的確有這樣的差別），而是有性質上的不同。生產與實踐相關，在滿足人類需求的同時也會產生新的需求並對人造成轉型的效果。然而，就

[13] 在這部份討論所指涉的，女性進行的再生產指的是人類勞動力的再生產，也就是生育。

再生產領域中，人如同其他動物一般，周而復始的生下新的勞動力。在這個領域之中，生理學決定了一切，生育看起來比較接近一種動物的過程而不是一種人類實踐方式，於是女性也被排除在歷史過程中。

此外，馬克思主義認為沒有普遍理性，理性是被社會的生產形式所限定。然而，從「自然的」性別分工開始，女性並沒有從事所謂的生產勞動。這或許可以用來說明過去自由主義對於女性的歧視，認為女性是非理性的、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的資格的。因為正如前段所說的，女性所主宰的再生產領域那「生理學」特質，所以女性根本不在「理性」的範疇裡。「女性與理性無關」這件事又證成了女性是「不充份的人」，這進一步可推導出來「不充份的人無法實踐，也無法進入（男）人的生產領域」。於是女性就在「不在可能自我實現的領域的人不可能是充份的人，又因為不是充份的人所以無法進入可能自我實現的領域，於是不充份的人始終是一個不充份的人。」這樣的惡性循環中無法自拔。然而這個「自然的」性別分工對於馬克思主義，與其說是自然的，不如說是不用討論的、理所當然的。女性基於生理結構生出小孩並不意味著她們對養育小孩有絕對的責任，可是女性卻首要地擔任養育小孩的工作，在生產過程獨立至家戶外之後，「女性負責養育」這件事造成了女性無法離開家庭出外工作，於是在經濟上依賴男性的後果。

「實踐」作為馬克思主義核心的人類本質概念還有另一個問題是，實踐既然是社會的，必然涉及到「分工合作」。可是 Jaggar 在《德意志意識型態》及《資本論》中看到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皆相信性別分工是最自然的分工形式，他們認為在家中的分工是自然的，因為它是由生理學決定的（Jaggar 1983, 67）。同時，馬恩二人也不認為女性的（以及所有人的）壓迫處境是基於生物學原因，所以關於女性議題的討論，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把女性的受迫與資本的利益做連結。比如說前面所提到過的 Zaretsky，他認為是資本主義造就了經濟與家庭的斷裂，於是女性無法參與到經濟過程從而經濟依賴著男性。Dalla Costa 與 James 其實也是用這樣的立場來連結女性解放與社會革命，她們認為女性讓男性免於做家務，於是男性可以為資本家工作更長的時間。

然而這種功能主義又再一次造成套套邏輯的問題，舉例來說，若把性別分工當成自然的、不用質問的分工而直接與資本利益連結，那麼關

於女性處境我們會看到這樣的說法：「因為女性要從事家務勞動，所以她們出外工作的條件較差，薪資也就會比較低，而又因為女性出外工作的薪資不如男性，所以女性在家從事家務勞動。」他們沒有解釋為何這個分工會發生，又為何女性會做「女人的事」，而男性做「男人的活」？把性別分工當成一種自然的、不用質問的現象的這種性別**盲**就產生以下這樣的觀念：「女性受迫是源自於她們的社會處境，而她們的社會處境**看起來**是歸因於她的生物學屬性。」

實踐作為人類本質的核心概念的第三個問題是，能夠讓實踐成為可能的生產領域對於人類的意義大於再生產領域。當這個分歧完美地與性別重合，就形成了女性身為人類之意義的缺乏。因為實踐預設了生產領域作為首要領域，於是馬克思主義優先把焦點鎖定在生產，而它把家務勞動，尤其是資本主義下的家務勞動視為在生產之外的。家務勞動被定義為再生產，也就是，人類勞動力的再生產，而這又由兩部份構成：既存勞動力的日常再生以及新興勞動力的產出與撫育。Jaggar 認為前者是消費行為，後者是生育。馬克思沒有對這兩個面向進行如對生產一般的理論性分析，這讓馬克思主義失去理解女性壓迫的必要概念資源。加上馬克思雖然認為消費與生產是經濟活動中的一個面向，消費會創造出新的生產需求，於是影響著生產，但最終是由生產決定消費的。當人們只能生產出黑金剛大哥大的時候，使用家用電話或是 BB Call 是可接受的生活水準，然而，當智慧型手機氾濫，BB Call 成為一個歷史的商品，不再有人購買。為了突破這種「生產決定消費」於是「男性決定女性」的盲點，Jaggar 指出有問題的並不是「生產決定消費」而是生產與消費的那條界線。以烹飪來說，它其實包含了栽種、挑選、運送、打包、購買與烹煮等一連串的勞動過程。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只有最後兩個步驟被算做是消費，至少，如果它們是在家中而不是在餐廳中進行。」（Jaggar 1983, 75）Jaggar 認為這種劃分方式造成女性的家務勞動被視為不是生產的，在市場之外的，於是，女性也在整個馬克思主義之外。

馬克思主義把由生物學決定的再生產勞動自然地視為是女性做的事，這讓再生產在政治理論之中很難佔有一席之地。而這正是女性主義者想要挑戰的。

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概念

如之前所提到的，Jaggar 認為自由、正義與平等是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因此她也從這三個面向來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概念，並說明馬克思對於人類本質的概念對政治學概念的影響為何。馬克思認為人類本質是透過生產活動來表達的，有意識的身體勞動改變了物質世界以滿足人類需求並同時轉化了人類本質。根據這種人類本質的概念，Jaggar 認為，「工作」—作為一種生產活動—一定是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核心價值（Jaggar 1983, 208）。[14] 工作同樣也是（新教倫理的）資本主義之價值，在資本主義之中，工作的過程是一種必要之惡（讓人不愉快但又不得不），工作的價值在於它的結果，它是人為了要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去做的條件。人們會工作是因為他們想要工作帶來的結果：財貨、錢，以及（偶爾可能會有的）聲望。工作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價值不同於在資本主義中。實踐在資本主義中以「工作」的形式來表現，但對於馬克思來說，實踐的過程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因為這不只讓人滿足他的需求（勞動結果的部份），同時也是人類發展出他自己的能力之首要手段。實踐是人類自我發展的基礎，但馬克思認為有兩種條件限制了人透過實踐以自由地發展潛能：特定的物質條件以及階級宰制（物對人的限制與人對人的限制）。於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關心的也就是該如何突破這些限制。

在特定的物質條件中，人為了要繼續生存下去所以需要特定的工作種類與數量，這些種類與數量是由普遍的生產力發展程度與人類需求的發展程度所決定。這種為了生存下去而不可避免的工作，馬克思稱為「自然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15] 的領域。

>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進行鬥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態中，

[14] 要說明的是，這邊所講的「價值」與馬克思慣常使用的「價值」意義不同。這邊的價值意思是可欲求的良善，與馬克思所說的，勞動之具體化的價值不一樣。
[15] 在 Jaggar 所引用的英文翻譯版本中，這個字被翻為 physical necessity。

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各種收入及其源泉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不管怎樣，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Marx 1972E, 926-927 )

因此，人類完整且自由地發展潛能的條件之一就是要超越這種自然必須性。當生產力發展到能夠構成「自由的領域」之基礎（也就是生產力超越滿足自然必須性的需求），人才有可能有完整的發展。可是，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在私有制下掌握了剩餘價值，並以他自身的利益來使用這些剩餘價值。在這樣的條件下，人的實踐以「被迫的工作」之形式來表現。可以看到，自由的兩種限制是彼此相關的，因為即使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足以構成「自由的領域」之基礎，階級社會中有的「剝削」預防了這個基礎真的形成。要達到自由只有推翻階級社會，建立共產社會才有可能。

據此可以得知，和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是個人的事不同，馬克思主義的自由是一種社會成就。至於自由主義也重視的正義與平等對馬克思主義來說則就沒那麼重要了。馬克思視正義為一種道德概念，而每一種道德概念是在特定的社會經濟系統下所形成的，它並不具有普世性或超越歷史的特性。馬克思認為正義是一種意識型態的語彙，它正當化了一些分配社會財貨的方式。在資本主義之下，正義是根植於「人類作為『個人』」的這種自由主義概念，這些個人的首要考量是他們彼此之間分裂且對抗的利益，特別是他們自己累積財富的這種利益。而關於平等，馬克思主義相信這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一個延續財富不平等與權力不平等的系統。當人不受其他人控制自己的生

活條件，以及每個人都參與重要的社會決定時，人才會是平等的。

為了要達到自由地透過實踐以達到人類完整的發展（一個由人類本質所影響的政治價值），階級社會的推翻以建立共產社會是必要的，這讓人從資本主義這種特定形式社會中的壓迫解放出來。關於女性主義者所關心的女性解放，馬克思主義中的分析與策略簡言之是這樣的：「女性的受迫處境源自於她們在經濟上依賴男性，若把女性帶入社會生產之中，則女性受迫處境就會被終結，女性也就獲得解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是把女性之所以是特殊壓迫形式的對象，是因為她們是被排除在薪資勞動之外。因此，就馬克思主義者如恩格斯看來，資產階級的女性比工人階級的女性之受迫情形要來得嚴重。這是因為資產階級的女性並不會投入薪資勞動中，這些「家庭主婦」在經濟上依賴著男性，於是她們受到比工人階級女性更嚴重的壓迫。相反的，工人階級女性因為出外工作所以有機會認知到她們的階級利益與身份，她們與工人階級男性有著一樣的權力。工人階級男性比工人階級女性有權力這是一種幻覺，「是一種意識型態的表面，封存住社會的真相，並讓資本家階級將社會劃分並統治。」（Jaggar 1983, 66）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女性主義是那些沒有工人經驗的人所發展出的意識型態，

> 「因為他們假設所有階級的女性都分享著共同的利益，也就是要廢除男性的特權，如此就遮蔽了階級劃分，所以他們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相較於專注於對所有男性表面的特權進行攻擊，女性應該要與工人階級男性並肩作戰，對抗資本主義以獲得他們共同、長期的利益。」（Jaggar 1983, 66）

女性工人與男性工人受著同樣的壓迫處境，他們一樣都被剝削、經驗著異化，沒有什麼不同的。而且她們達到了與男性平等的物質基礎，若女性的特殊壓迫形式繼續著，那一定是源於過時的意識型態。

因此，女性應該要投入社會生產之中，如恩格斯說道：「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整個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而要達到這一點，又要求個體家庭不再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Engels 1972, 87，

譯文有所更動）[16] 然而恩格斯也看到若女性同時仍負擔著家務勞動，那麼要她們參與公共生產是困難的事，「如果她們仍然履行自己對家庭中的私人事務的義務，那麼她們仍然會被排除於公共的生產之外，而不能有什麼收入了；如果她們願意參加公共的勞動而有獨立的收入，那麼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義務了。」（Engels 1972, 87）為了要解決這個困境，恩格斯提出了社會化家務勞動的方案，「私人的家庭經濟變為社會的勞動部門。孩子的撫養和教育成為公共的事業；社會同等地關懷一切兒童，無論是婚生的還是非婚生的。」（Engels 1972, 89）這些公共服務將會消除家庭的經濟基礎，「隨著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個體家庭就不再是社會的經濟單位了」（Engels 1972, 89）但這不代表家庭不再存在，家庭還是會是小孩的生產單位，只是男性宰制的基礎將會消失。婚姻也不再會有經濟上的考量，只留下感情的動機。

Jaggar 認為，以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一方面，女性需要投入公共生產之中以達到解放，另一方面，階級革命也需要女性的支援。若女性基於經濟原因迫使男性繼續為資本家工作，或是女性以更低的價格投入勞動力市場，這都將使階級革命成為不可能。然而，馬克思主義真的有肯認到這一點嗎？Jaggar 認為馬克思主義具有許多問題，讓他們對於女性解放的策略無法成功，這些批評在下節中介紹。

四、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概念的問題

Jaggar 花了很多力氣在指出馬克思主義組織中對於女性的性別歧視，但組織中的（於是也就是實踐的）問題其實反映的是理論問題。在此將主要介紹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策略上對於女性解放的問題為何。可以分成三點：以工廠工人為主體的革命策略、女性議題的範圍設定，以及個人生活的政治學之否認。

Jaggar 指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組織的革命策略是以工廠工人為主體，這個策略看起來是無關性別，但其實是性別歧視的，因為女性在現實中並不主要佔據著工廠工人的位置，從而她們不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

[16] „Es wird sich dann zeigen, daß die Befreiung der Frau zur ersten Vorbedingung hat die Wiedereinführung des ganzen weiblichen Geschlechts in die öffentliche Industrie, und daß dies wieder erfordert die Beseitigung der Eigenschaft der Einzelfamilie als wirtschaftlicher Einheit der Gesellschaft.“（Engels 1884）

行動內。再來，這種策略也被批為是「經濟主義」的，而女性主義者認為經濟主義是有性別偏差的，因為「經濟」本身就根植於並不由女性首要擔任的生產勞動。[17] 也就是說，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策略中實際上很少有女性的空位。此外，馬克思主義關於女性解放的策略本身也有問題，若女性投入公共生產之中獲得與男性相同的物質基礎即有機會打破女性的受迫處境，那麼女性根本不用等到階級革命成功，在資本主義中投入勞動力市場即可獲得她們的特殊壓迫形式的解放。然而我們可以看到，至少在臺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為 50.64％，佔勞動人口 43.99％的比例，但女性特殊的壓迫形式仍沒有消減的跡象，女性與男性的不平等反而在勞動力市場中擴大（如擔任高層主管的女男比、同樣工作內容的薪水比）。馬克思主義預設女性工人與男性工人有一樣的權力，這也使得這個理論很難來解釋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差異。這種預設也表現在女性議題的範圍的設定上。

Jaggar 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女性議題）這種概念假設了女性的宰制是受限於在社會生活的特定領域。」（Jaggar 1983, 236）然而對女性主義者來說，每一個議題都是女性議題，如同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每個議題都是階級議題。把女性議題劃出範圍的同時也限制了女性覺醒的範圍，並也再一次的強化了性別分工。且，就女性主義者看來，馬克思主義者所選取的女性議題都與挑戰男性特權無關，他們所支持的常是男性與女性利益一致（甚至是更有利於男性的那些）的議題。Barbara Ehrenreich 曾說，墮胎權一方面同時也讓男性不再有責任（Jaggar 1983, 238）。而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不支援的女性運動，他們總是可以提出理由，而女性主義者懷疑這只是因為他們不願面對男性宰制而找出的理由。有些男性馬克思主義者反駁這種看法，因為在他們眼中，女性的特殊壓迫形式只是資本主義的副產品，於是要終結這種壓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終結資本主義，這讓女性運動的主張失去正當性。馬克思主義者希望女性和他們一起對抗資本主義而不要分散力量，但女性所面對的並非共同對抗的同伴，而是直接的壓迫。女性主義者也擔心，現今在馬克思主義組織內都有著性別歧視，那麼這個組織所帶來的革命是否真的能終結性別

[17] 有趣的是，在希臘時期經濟指的是家戶內的家政管理，如亞里斯多德的《oikonomia》。當然，這個時期的「家」與現代社會的「家」有很不同的意義，當時也還有奴隸制，家庭裡不只是有血親與姻親。而到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指的是「君主」的「家」政管理，也就是國家的經濟管理。

歧視。

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在革命策略上以（男性）工廠工人為主體，另一方面也劃定了女性議題的範圍。於是，對馬克思主義來說，基進女性主義所講的「個人即政治」是沒道理的，由此發展出的個人生活式的改革更不會有成功的可能。馬克思主義從人類本質概念開始對於生產活動的重視，導致它對其他勞動活動的忽略。馬克思主義者不注重，甚至沒有意識到家中的不平等。然而，資本主義其實影響著生活的每個面向，舉例來說「工人階級不只是在職場中創造出它自己，它也在鄰裡間與再創造活動中創造出它自己，在每個社會機構中資本主義價值被強化與被正當化：在家中、學校、醫院，以及透過娛樂。」（Jaggar 1983, 235）馬克思主義沒有注意到個人生活與公共生活之間的關係，這導致了它無法適當回應女性在家中進行的勞動問題。有趣的是，當馬克思主義者個人主張自己並不是性別歧視者時，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對女性沒有暴力行為與性騷擾、也共同負擔養育小孩的責任、分享著家務，女性主義者對於這種個人生活式的實踐並不滿意，他們認為「主要的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作為個人有多少程度是性別歧視者，而是男性宰制的物質基礎是否會如同馬克思主義者所想的那樣隨著社會主義的到來而被消滅。」（Jaggar 1983, 238）

**小結**

在實際的政治行動中，女性主義者對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女性解放策略感到不足，因而試圖發展出新的策略，也開啟了家務勞動論戰。這個論戰反映出了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之間在理論上有必須進一步探討的問題，Hartmann 指出之所以有問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而 Jaggar 則進一步說明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本質以及政治學的概念中就有性別的問題。基於女性的處境，的確看不出也看不見「女性」在馬克思主義裡的位置。對此，認同於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女性主義者試圖使用馬克思既有的概念來分析女性處境。這種馬克思的女性主義，將在下章討論。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第三章　女性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概念之改造與應用

女性主義者雖然對於馬克思主義有諸多批評，可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犀利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現象，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基進女性主義有的普遍化及本質化等問題，這對於部份女性主義者來說仍是具有吸引力的。他們認為，儘管馬克思主義有上一章所提的三個問題，但經過適當的使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對於女性議題的處理仍然是有幫助的。並且，基於女性主義問題的特殊性與獨立性，他們堅持，一方面不能把女性主義所針對的父權體制納入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之中（如過往傳統馬克思主義所做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只把父權體制視為外加於資本主義的另一變數，因為這種說法必須要說明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這兩個變數的關係為何，而在之前女性主義提出的解釋則是讓這種雙體系論越發複雜，因此，Jaggar 與 Young 有了單一體系論的嘗試。

如前章所提到的，Dalla Costa 與 James 認為看似孤立於家中的家庭主婦實際上就是在社會生產之中，因此應該要償付家務勞動。Jaggar 沿著這個路徑進一步使用「異化」概念嘗試證成，看似排除在資本主義之外的家庭主婦，其實就是在資本主義之中。而關於 Hartmann 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問題，Young 則企圖使用「性別分工」這個概念框架來突破馬克思主義與基進女性主義兩者的盲點。Jaggar 與 Young 基於對雙體系論的批評而發展出單一體系論，但他們的嘗試卻又落入他們對於傳統馬克思主義批評中，雖然他們並未使用「階級」這個概念，但是他們直接借用「異化」與「分工」等馬克思的概念，實則再一次把女性主義問題消融在馬克思主義之中。他們想要結合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企圖，由 Irigaray 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能性。以下就對她們的使用進行說明。

## 第一節　家庭主婦之處境—異化

在 Dalla Costa 與 James 的文章中，兩位作者指出，傳統馬克思主義並沒有看出女性在社會的生產循環中所扮演的角色，女性被視為是在生產循環之外，本質上是在家庭範圍內提供一系列的使用價值。兩位作者試圖以無薪奴隸的生產性、消極性的生產性與紀律的生產性來說明女性在家中也是從事著生產勞動。對此，Jaggar 指出，就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來說，家務勞動既是生產的，也是非生產的。因為馬克思主義者使用「生產」時是有不同的意義。

有時候「生產」指的是任何直接滿足人類需求的勞動種類（廣義），然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脈絡下，「生產」特別指的是生產出剩餘價值（也就是利潤）的勞動。女性的家務勞動在廣義下是生產的，然而在狹義下是非生產的。Jaggar 認為當代的家務勞動組織是早期生產模式的殘留物，馬克思也曾說過：「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生產過程總是有特定的部份是帶著典型的早期生產模式，在其中資本與薪資尚未存在，於是資本主義式的『生產』概念與非生產勞動是很不適用的。」（Marx，《資本論》第一卷附錄，轉引自 Jaggar 1983, 218）就如同在動物園中不會只有動物，花園裡不會只有花一樣。然而 Jaggar 認為「既然家庭主婦不從事資本主義生產，她們與她們家庭裡其他成員的關係、與其他家庭主婦、與自然，以及與自己的關係就不是構成資本主義特色的那些關係。既然異化構成了在資本主義下的關係之獨特的品質與結構之特色，家庭主婦不能被形容成是異化的。」（Jaggar 1983, 218）

然而，Jaggar 認為「異化的概念可能為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對女性當代的壓迫之系統化批評提供一個理論框架」（Jaggar 1983, 307）。她希望透過異化可以「連結女性在家中的壓迫與女性和男性在薪資勞動下的經驗」（Jaggar 1983, 317），並根據這種「基本的相同性」，「男性馬克思主義者可能會產生一些動機去認真看待女性的特殊壓迫形式。」（Jaggar 1983, 317）她列舉了許多例子來說明資本主義下的女性其實也是受到異化的，以此說明「在當代社會，女性在她們生活中所有面向都是異化的。此外，這種異化採取了特定的、性別特殊形式。」（Jaggar 1983, 308）女性的異化大概可分成這幾種形式：性異化、與自己異化、與其他女性異化。

就女性主義者看來，女性的（異性戀）性異化是女性特殊異化的第一種形式。女性無條件地被視為性對象，且基於經濟原因，女性用性取悅男性以生存下去。她們被期待在並不明顯是性的場合中具有撩撥男性的性的效果，更別說是有關於性的場合，於是女性被迫地花費時間與金錢在打扮上，學習激起男性的情欲並滿足他們。這也就是說，男性比女性更控制著女性的性表達，於是，「女性的性是為男性而非女性自己的享受發展出來的。為此，女性的性情況像是那些與他們勞動的過程與產物中異化的薪資工人。」（Jaggar 1983, 309）女性的性異化之問題不只是女性無法自由地表達她們的性偏好，她們也無從探索起她們的性偏好。她們的性滿足來自於從男性的立場來幻想自己。男性控制著女性的性也造成了女性與自己異化，因為女性首要被視作為性對象，女性依據著她們的身體素質，以及展現這些素質的技巧而被評量

著。女性的身體被肢解成各個部位：胸、臀、腿、腳、腰、臉，和她只是她身體各部位的總和。Jaggar 指出「這種她的身體部位的性拜物或具體化（reification）是碎裂女性的極致方式。它不只強迫造成了在她們身體與其他面向間的斷裂，在她們身體部位間也有斷裂。」（Jaggar 1983, 309）也許真正的問題在於，（基於經濟原因）女性開始接受了男性對她們自己與她們身體的認同（identification），並也跟著自己身體部位的拜物。於是女性心中也產生的分裂，「女性的性對象化產生了女性意識的雙重性。他者的凝視是被內化的，所以我自己同時成為看者與被看者，鑑定人與被鑑定人。」（Bartky，轉引自 Jaggar 1983, 309）當男性把女性定義為滿足他享受的性對象，這造成了女性與其他女性之間的異化，因為她們成為了競爭男性注意的對手。這使得女性可能傾向於「當女性支持與男性需求是有衝突的，忠誠於男性總是第一優先。在女性之間的性競爭常讓她們不能察覺到她們基礎共用的利益，就像薪資工人常不能察覺到他們與他的共事者有共用的利益。」（Jaggar 1983, 310）

此外，女性還有一種特殊異化形式—母親。女性在性方面無法自由地表達，女性也無法控制她們的母職。以小孩個數來說，當有勞動力的需求時，女性常負擔比她所希望的小孩數更多的小孩，而當小孩成為一種經濟負擔時，女性又不能養育她們所希望的小孩個數，她們並不是可以決定自己要生育幾個小孩的那個人。女性無法決定她的產品數量，也無法決定她的生產過程。在懷孕與生出小孩的過程中，女性的身體像是生產原料，被各種儀器觀察，分娩變成了一種高科技的事件，女性似乎無法自己生下小孩。再來，女性總是以父權標準來養育她們的小孩長大（Jaggar 1983, 311），科學化的養育方式認為母親是小孩發展的主要能動者，也是最主要的障礙。母親與小孩發展的關係是牽一髮動全身。另一方面，在核心家庭的結構下，母親一人照顧小孩，兩者相加，造成母親容易以小孩的發展為主而忽略自己的需求。且，當小孩作為勞動力商品進入勞動力市場，母親間又有「產品競爭」的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馬克思在《巴黎手稿》所說的：「他（工人）給予對象的生命作為敵對的和異己的東西同他相對立。」（Marx 1972F, 91）看來可以改寫成：「她（母親）給予對象（小孩）的生命作為敵對的和異己的東西同她相對立。」在資本主義下，人作為一種勞動力商品，母親產下小孩這種生物學必須性領域的事，其實也成為一種異化經驗。

總而言之，以 Ann Foreman 的話來說：「女性化（feminity）本身就是

異化。」（Jaggar 1983, 317）在男性宰制的社會中，把男性化與女性化定位成相對的形式，因此在這個範圍內，兩性一定會與彼此異化，因為他們有不相容的利益，女性主義反對的是這件事。這種男性化與女性化的概念使得男性與女性傾向過度發展於特定的能力而犧牲掉其他面向，像是理性分析與直覺。

Jaggar 其實並沒有很清楚地說明為何她會挑出「異化」這個概念作為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理論框架，但從她在馬克思主義人類本質概念與政治學概念的分析中對異化的強調，可以看出她在鋪陳使用異化來批評女性當代的壓迫的重要性。不同於 Dalla Costa 與 James 用無薪奴隸、消極性與紀律的生產性來說明家庭主婦適用於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她使用異化來分析「不能被形容成是異化的」家庭主婦，她的策略應該是這樣：既然「異化被標示為資本主義的特色」又「家庭主婦不在資本主義關係中」於是「家庭主婦不能被形容為異化的」，那麼，只要證成「家庭主婦其實是異化的」，那麼就能證成「家庭主婦不在資本主義關係中」此一前提是錯誤的，於是家庭主婦其實也在資本主義關係之中，她們也是社會革命的一部份。然而這樣的證成有許多問題。

第一，概念上的問題。Jaggar 看來是因為異化為馬克思的人類本質概念的重點，在馬克思的政治學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所以企圖使用異化這個概念進行改造。但從批判的角度看來（或說是詮釋學的角度），也許正因為她注重異化這個概念在女性議題上的運作，所以即使異化被認為是一個不一致的概念，[18] 仍不減她認為異化這個概念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也因此她並沒有進一步的去思考異化這個概念的真正問題，也就是異化到底何以成為可能？第二，邏輯上的問題。Jaggar 太注重於女性異化的證成，以致於她忽略了，即使女性真的承受異化，這也有可能表示的是「異化被標示為資本主義的特色」此一前提是錯誤的，也就是說，異化其實不若她所提的那麼重要，異化可能也在其他社會形式中存在著。第三，策略上的問題，即使女性受到異化，家庭主婦也在資本主義關係之中，Jaggar 這樣做只是證明瞭異化

[18] 異化這個概念的不一致在於，「異化了」的人類本質預設了有一個「沒被異化的」人類本質，一個前面不能加上任何特定屬性形容詞的「人類本質」，而這與馬克思認為人類本質是一個歷史的產物是不一致的。Jaggar 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但她認為儘管異化大多出現在馬克思早期的著作，可以在他的晚期著作中還是保留了許多異化概念的元素，如在《資本論》中對工人的描述，因此她認為異化這個概念對馬克思來說是重要的（Jaggar 1983, 57）。

的解釋範圍比原本來得大，也就是說，這個概念的有效性比之前更強，但並無助於她所宣稱關心的「女性解放」。她證成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既然如此，馬克思主義關於女性處境的看法並沒有錯誤，只有適用範圍的問題。基於這個證成發展出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策略其實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附加物，而這又是她所反對的東西。

Jaggar 這樣的做法讓自己陷入了一種兩難局面：若連家庭主婦也因有異化而在資本主義之中，整個女性都在資本主義之中，那麼何以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不適用於女性？且，若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不適用於女性，那又為什麼拿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分析女性處境？Jaggar 自己也承認，用異化概念來分析女性的當代壓迫，無可避免地會把這壓迫與資本主義連結在一起。她認為當代女性的異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歷史性特殊產物，可是這不代表資本主義的廢除就會消滅這種壓迫。（Jaggar 1983, 317）她一方面相信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另一方面又懷疑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改革方案，可是，如她自己所說，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提出了許多新問題，但都沒有獲得好答案。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也許對解放階級與性別都有承諾，但它並沒有提出一個新的方案。Jaggar 還有一個問題是（同時也幾乎是所有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的問題），除非馬克思主義可以成功地說明何以女性與男性承受不同的壓迫形式，否則應該要說明資本主義的壓迫形式與女性的特殊壓迫形式（也就是父權體制）的關係為何。在沒有說清楚這兩者關係的情形下，使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來說明女性處境並聲稱這種作法可能可以回應新的問題只是一種掩耳盜鈴的作法。

Chengchi University

### 第二節　性別盲之解藥—性別分工

Young（1981）認為 Hartmann 在她的文章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因此馬克思主義對女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處境之分析無法專注在性別差異與階層化的議題上。基於基進女性主義的觀點看到了馬克思主義有這樣的缺陷，但同時也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到基進女性主義的缺陷，因此 Hartmann 試圖提出新方向來解決這個問題。但 Hartmann 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未來的展望預設了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兩個獨立體系的存在，兩者的關係有兩種可能：一、父權體制是一個意識型態的或心理的結構（基進女性主義的看法），而資本主義處理的是社會的物質關係，兩者是上下層建築的關係。如 Mitchell，

但這個版本會把女性壓迫給去歷史化以及普遍化。在不同社會環境下的不同形式的女性壓迫變成了只是父權體制這同一個普遍性體系的不同表達方式。且這個方法讓父權體制並沒有物質基礎，而這正是一個獨立體系的本質（一個獨立的體系應該會有自己的物質基礎），這讓馬克思主義維持對物質的社會關係之霸權。因為認知到這種版本的弱點，Hartmann 選擇了第二個方案。二、父權體制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的物質關係，獨立於資本主義，也與資本主義有交互作用。但若如此，我們會發現，很難從生產的社會關係（資本主義）中分離出父權體制。而 Ferguson 則提出「性—情感勞動」這另一套生產關係。可是不管如何，這種試圖從生產關係中再區分出另一套關係的途徑都有賴於 Petchsky 所稱的「分離領域模式」，但這種模式有問題。它預設了家庭與經濟是不同的領域，而把家庭視為女性壓迫的首要場所。這種模式出來的理論會無法把女性壓迫的分析帶到家庭之外的地方。總之，不管是哪種可能的理論方案，都讓馬克思主義維持它生產關係的理論，女性壓迫問題只是馬克思主義問題的附加物，只要外掛性別階層的概念就好。只要如此，馬克思主義就會繼續宰制女性主義。

Young 認為應該要發展出一個分析框架，它把物質的社會關係視為一個系統，其中「性別差異」是它主要的特質。而性別分工會是這種分析框架的核心類目。（如同馬克思主義把階級當作是分析的主要類目）一個要解決女性壓迫問題的理論，它的核心應該就是女性壓迫。她提出以「性別分工」作為分析工具的主張，認為性別分工可以保留唯物主義的框架，若以此來分析女性處境將能有更好的解釋力。她指出分工這個類目與階級一樣地常出現在馬克思的作品中，但階級這個類目繼續地發展，分工則否。不過，她認為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中可以看到分工比階級有更廣與更基本的運用，它可以論及勞動活動本身。Young 舉例，分工比階級更適合分析專家角色與公僕在當代資本主義中的問題。而在工人階級中的種族問題，只要加入種族的關連就能進行分析。且，她也認為在現在已存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明顯的宰制關係也比較適合用分工而非用階級來分析。

其實若 Young 能依此途徑發展下去，她將能真正做到她所期待的單一理論，然而她選擇專注在性別屬性的分工。她認為性別分工的分析讓女性位於歷史唯物論的核心位置，因而不會忽視掉男性宰制的意義，也能讓性別關係不只是生產關係的一個面向，而是它的基礎。Young 認為「性別分工是第一種分工，且在所謂的原初社會中，這也是唯一的制度化分工。」（Young 1981,

53）也就是說，階級是基於性別的。這個說法在雙體系論裡面反而消失了，因為性別與階級在其中是兩個分立，而不是上下關係的元素。Young 指出，性別分工分析也使得我們可以以社會結構的方式來解釋女性從屬地位的起源與維持。這並不是說從生理學與心理學的角度來理解女性從屬地位是不重要的，因為性別分工預設了生理性別，且女性的分工是受到她們生理上生育功能的影響。重要的是「性別分工分析讓我們以性別特殊的方式來對勞動的社會關係做唯物分析，而又不用假設普遍來說所有女性或是在特定社會中的女性有一個共同的與同一的處境。」（Young 1981, 55）也就是說，這種分析方式可以避免掉基進女性主義，與基於基進女性主義洞見的雙體系論可能會有的普遍化問題，它們認為「在女性壓迫之下的獨特體系，它試圖主張*作為*女性，不管我們的歷史位置或處境，我們都是在同一個處境中。」（Young 1981, 55，著者自譯，斜體為原文所加）性別分工分析可以解釋女性處境的變化。此外，這種分析方式把女性壓迫整合至社會經濟體系裡面，於是可以要求馬克思主義者在對社會構造進行分析時把女性的處境與壓迫列為必要的元素。

從性別分工的角度出發，Young 主張「女性的邊緣化，以及，因為邊緣化而作為次等勞動力的狀況，是資本主義必要與基本的特質。」（Young 1981, 58）她引用 Saffioti 的說法，指出資本主義「本質上要求只有部份的生產人力被僱用。」（Young 1981, 58）於是這系統會出現一些標準以區分出哪些生產人力先被僱用，另一些則否。而「這個父權體制意識型態的前在（preexistence），與女性必須在小孩附近的狀況，兩者伴隨著彼此運作，讓性成為最自然的標準。」（Young 1981, 58）當種族與族裔出現時，它們也加入了劃分的標準，但「性的區分總是最明顯與永久的，女性不太會被『同化』。」（Young 1981, 58）Young 認為，「藉由看到資本主義體系本身本質上父權體制特質，這可解釋男性工人的性別歧視而不用訴諸一套獨立於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體系。」（Young 1981, 62）Young 指出基於：一、如同在資本主義之前就存在的階級社會不會被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可證明所有階級社會有共同的結構，且這結構獨立於資本主義體系，父權體制也應該這樣地被理解。二、父權體制並非是不變的、跨歷史的，它也有轉型的。女性的處境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反而惡化了，因為資本主義讓她的經濟獨立性不再，於是法律權利也是被剝奪的。因此，即使女性的從屬地位早於資本主義就已經出現，這並不能證明它在資本主義中的存在有獨立於資本主義的基礎。她所理解的資本

主義與父權體制的關係如下：

> 「資本主義……從開始是建立在性別階層之上，這個階層把男性定義為首要的，女性是次要的。……主張資本主義經濟需要女性的邊緣化，我並不是主張我們不能在邏輯上設想出一個沒有發生女性邊緣化的資本主義。相反的，我主張的是考慮到最初的性別差異與之前存在的性別歧視意識型態，一個女性作為次等勞動的父權體制資本主義是唯一的歷史可能。」（Young 1981, 62）

可以看到，Young 認為不能只安於「父權體制—資本主義」兩者分立的雙體系理論，應該要從馬克思主義與基進女性主義各自的洞見發展出一個單一的理論，使得資本主義父權體制是一個體系，而 Young 指出，這個體系的核心特色是女性的壓迫。然而 Young 對於核心特色的設定就說明瞭這項任務不會成功。因為如果一個理論只能解釋特定的壓迫，那麼它就是還不夠完善的理論。而若一個理論能夠解釋所有的壓迫，那麼它的核心特色就不會是特定人的壓迫。由 Young 的企圖可以看到，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他們給自己的限制。她們不願放棄馬克思主義對於結構的分析，也不願意放棄基進女性主義者對於內容的分析，以致於他們無法再超出這兩者相加的範圍一步，於是也就無法從更高的視野來看這兩種洞見的關係而發展出真正的新理論。此外，Young 認為階級基於性別分工，但性別並不獨立於資本主義。Young 所指出的性別分工分析的優點其實是「分工分析」的優點。至於性別到底從何來？Young 其實迴避了這個問題。她隱含的看法可能有本質主義的問題。如她在解釋女性的邊緣化時引用的說法是「這個父權體制意識型態的前在（preexistence），與女性必須在小孩附近的狀況，兩者伴隨著彼此運作，讓性成為最自然的標準。」（Young 1981, 58）性別分工的基礎是基於生理性別而來的性，它或許可以解釋為何有些女性比較有權力，因為她們有生產工具的近用權，但它還是無法說明為何一些女性有生產工具近用權，另一些女性卻無法取得。

### 第三節　超越既有的馬克思主義—當女人作為一種商品

Jaggar 從馬克思人類本質的概念開始分析起，說明馬克思主義對於女性主義是不足夠的。然而，Jaggar 自己又使用了馬克思的「異化」概念作為整

合女性與工人的分析框架。Young 也有同樣的狀況，她一方面肯認馬克思有性別盲，但也不接受 Hartmann 那雙體系論的途徑，於是又回到了馬克思曾經使用但沒有發展的「分工」概念，作為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新的理論提案。這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改造不如說是補足了過去馬克思主義者所沒有做的分析。她們並沒有超出馬克思主義既有的範圍，透過把馬克思主義的概念運用在女性處境，她們完善化了馬克思主義。換句話說，儘管 Jaggar 與 Young 對馬克思主義想要有如哥白尼的日心說取代托勒密地心說的挑戰，但她們更像是還不願放棄哥白尼的克卜勒。[19] Jaggar 與 Young 並沒有達到她們所說的目標而不自知，是因為一方面她們認為馬克思主義不足以解釋女性處境，另一方面又確信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是有效的，因此當她們發現馬克思主義的概念用在分析女性處境是可行的，她們所認為的問題也就獲得解答，她們也就不再追問，為什麼女性的處境會被忽略如此久，而又到今日才被看見？相比起來，Irigaray 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比較像是克卜勒與哥白尼，她認為《資本論》就是男性中心的著作，她拆穿《資本論》的性別中立外衣，從父權體制的角度出發，把女性視作商品來分析。正因為她肯認了《資本論》的偏誤，反而得以正確地使用馬克思主義。儘管她是精神分析的背景，並非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要的研究內容，但她在〈女人的市場〉中著實有著與過往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不同的見解，以下述之。

Irigaray 在〈女人的市場〉一文中首先表明她的立場，她認為我們所知的社會與文化其實是奠基於「交易女人」之上，女性的價值只限於用來建立男性之間的關係或是為男性獲得利益，而異性戀則是讓男性與自身的關係，以及男性之間的關係得以順利運作。接著她借用了馬克思在《資本論》對商品的分析來闡述女性被交易的處境，把原本對物與物之間的價值形式之分析，轉用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 Irigaray 的角度看來，馬克思對「商品」這個資本主義的財富基本形式之分析，也可被用來理解女性在父權社會中的地位。她認為在這社會中，社會秩序是由交易女性這一「『生產者—主體』相對於『商品—客體』」關係而得以確立的，為了維持秩序，「生產者—主體」不能

[19] 哥白尼的日心說與托勒密的地心說常被用作「典範轉移」的例子，然而日心說的確定並不是在哥白尼手上就完成。哥白尼的日心說設定行星運作的軌道是圓形，這點由克卜勒的計算所推翻。克卜勒本身並不從事星體觀測，他受僱於長於觀測的丹麥人第穀，幫第穀整理行星的正確軌道。雖然克卜勒也相信日心說，但他發現哥白尼的圓形軌道設定並無法解釋第穀所觀測到的數據，他最後放棄了哥白尼與其前人們「對圓形的執著」，創立了「行星以橢圓形軌道運行」的學說（高湧泉 2008）。

以商品的形式運作，而「商品—客體」也不能以主體的身份參與交易（Irigaray 2005, 225）。而打從私有財產制與父權家庭的源起，社會剝削就已經發生。她提到在父權社會中，男性擁有多位女性的現象，正如同資本社會中，人累積財富一般。但為什麼男性一定要擁有女性呢？因為女性代表了再生產的使用價值，而這對男性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事（Irigaray 2005, 225）。

雖然 Irigaray 在使用馬克思的理論進行對比時是有些混亂的，但她如此的借用理論，的確能獲得一些洞見。她有理解到，商品的價格與它的使用價值無關，如：「女人的價格並非根據她身體的『特性』而定——即使她的身體便是支持該價格的物質所在。」（Irigaray 2005, 226）她也有認知到，使用價值與價值兩者的不可共量，如她認為在女性在成為商品後，女性「立即成為兩樣東西：一為實用的物品，二為價值的承載體。」（Irigaray 2005, 227）然而就馬克思的說法，實用的物品（使用價值）「同時」就是價值的物質承載者（Marx 1972D, 48，引號為本文所加）。Irigaray 把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與價值解讀為兩樣不同的東西，於是她認為作為商品的女性也受制於分裂，女性被二分為兩個不可調和的身體：自然身體，與具有社會價值且可交易的身體，而後者是模仿男性價值的表現，是商品價值之所在（Irigaray 2005, 232）。正因為 Irigaray 認為使用價值與價值是不同的東西，因此她認為價值是由作為交易者的男性所給予。她指出，因為交易行為需要兩個客體（對她而言，也就是兩個女人）在一個平等的關係中，在這關係中還必須要有一個非此亦非彼的第三者（a third term），好把交易的客體（也就是女人）化約至共同的特性，交易才得以進行。[20] 這個第三者，對 Irigaray 來說，是黃金或陽具。[21] 據此，她進一步指出，男性透過市場交易來擁有女性，而女性在市場上的價值是根據作為男性勞動產物來評斷（Irigaray 2005, 226）。也就是說，她認為商品的價值並非是商品的內部因素，而是由外部給定，「商品的價值永遠也無法從其自身之中尋得」（Irigaray 2005, 228）。這使得她說：「對商品而言，並無一面鏡子得以用來複製商品，使之不僅是同時是自身，

[20] Irigaray 把交易的進行倒果為因，並非有一個第三者將商品化約至共同的特性，交易才得以進行，而是因為商品本身有共同的特性，所以才得以有第三者出現進行交易。且，事實上並不會只有第三者，因為若只有一個交易者，交易是不會發生的。Irigaray 有這種倒果為因的說法是因為她把使用價值與價值視為兩個分裂的東西，因而有機會誤解價值是由第三者外加於商品之中，且，她認為價值是由男性給予、決定，而女性是承擔價值的使用價值，因此，她又把賦予價值的男性與承擔價值的女性視為對立。或者說，是因為她把男性與女性視為對立，所以她把賦予價值的人類勞動與承擔價值的自然體視為是兩個不同的東西，而非商品的兩個因素。

[21] 由此可以明顯看出 Irigaray 有黃金拜物的問題，據此也可以說她並沒有真的看懂《資本論》。

而且也是『自己的』反映。」（Irigaray 2005, 228）因為她認為商品總是需要一個外在的第三者來評定它。作為商品的女性和作為交易者的男性不同，她認為「男人被反映在其他男性之中」（Irigaray 2005, 228），女性作為商品，反映的是男性的價值，「商品，女人，正是反映男人價值的鏡子，亦為了男人的價值加以反映。」（Irigaray 2005, 228）

在此，她從「使用價值—價值」之商品內部關係跳到了「相對價值—等價物」之商品與商品之間的關係，她偷渡了商品的另一個意義，也就是「等價物」。當商品在價值形式中佔據「等價物」的形式時，它是用它的商品體來表現相對價值之價值量。若商品 A 為商品 B 的等價物時，商品 A 本身的價值量固然無法同時被人所知，（因為，一個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是它的一體兩面，而它在價值形式內同一時間只能表現其中一面）但也因為是一體兩面，所以它同時又是看似對立的兩者。Irigaray 把一體兩面的關係視作一個對立的關係，而這兩種關係（一體兩面的關係與對立的關係）相同之處在於它們在二者之中只能擇其一，但前者是統合，後者是斷裂。無怪乎她會認為女性在成為商品之後便受制於分裂，並認為「成為商品後，女人立即成為兩樣東西：一為實用的物品，二為價值的承載體。……唯有在交易女人時，才得以感受到一些——不用說，神秘的——女性價值。女人因此唯有在她得以被交易之際，才具有價值。」（Irigaray 2005, 227）這裡又錯解了商品與價值之間的關係。一來，物品並非被交易所以有價值，而是因為它有價值，所以才得以被交易。二來，商品並不會是 Irigaray 所說的「實用的物品」與「價值的承載體」這「兩樣東西」，且她所說的這「兩樣東西」看來都對應的是馬克思所說的「使用價值—商品體」。由於使用價值與價值的「一體兩面」，所以商品「看來」具有神秘性，因為我們只有透過價值形式這種關係，才能夠「看見」商品之內在構成。另外，她又說：「男人那一方將『自然』受制於『勞力』之下，是故便把『自然』看作是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Irigaray 2005, 224），然而交換價值來自於人，「自然」並不會產生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人加在自然之上的。Irigaray 錯解了價值之間的關係，以及忽略價值形式的問題，導致她無法進一步去思考：男性相對於女性佔據「等價物」的位置，為何，且得以是在「相對價值」的位置上？

會有這些混亂的錯用，源自於 Irigaray 認為男性與女性之間是質上相異的。她認為女性對男性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定要擁有的商品，因為女性「代表」再生產（生產小孩以及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人體）。這也就是說，她

認為只有女性才能進行再生產，然而男性也需要這件事，因此只能透過擁有女性才得以佔用此一使用價值。在馬克思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知，商品會進入價值形式有兩個條件：質上相異且有可共量性。因為質上相異所以有交換的需求；因為有可共量性所以有交換的可能。然而 Irigaray 將目光停留在質上相異的這一面，而無法看清價值形式全貌，只知道男性在這價值形式中所求為何（再生產的使用價值），但卻不知他為何能求（物質基礎為何），且，她也無法解釋為何男性一定需要女性所代表的再生產。對於女性來說，也就不知道自己為何會進入這價值形式中，更別說要如何離開。而 Irigaray 一味把女性視作商品，這件事讓她對《資本論》的批評失了力度，因為她無法回答，既然男性是女性價值的標準，那麼男性價值又從何而來？因為認為男女質上相異，又把目光鎖定在「男性宰制女性」上，Irigaray 把男女關係完全視做敵對關係，「（經濟體制）均要求女人出讓自己，成為消費中的異化物，出賣她們自己給並未親身參與的交易，而男人卻能免於像商品一般遭到利用流通。」（Irigaray 2005, 223）男性好似佔盡一切優勢，躲在交易體系之後坐享福利。然而 Irigaray 忽略了在勞動力市場中，男性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也是把自己當作商品一樣進行交易。也就是說，Irigaray 錯認了敵人，男性並不是罪魁禍首，他們同樣也深受其害。至於，造成這種狀況的究竟是資本主義或是父權體制，則是正是本文所稱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爭辯之核心。

雖然 Irigaray 這篇文章看似混亂與錯誤百出，但洞見在於，她利用商品的分析來處理女性的處境。她引入了價值形式中「等價物」的概念，價值形式本身也有雙重性，這雙重性也來自於商品本身的雙重性。一來在價值形式兩端的商品質上相異，所以它看起來可以是一個「交易」的模式，看來是用 A 物換得 B 物。另一方面，因為兩端的商品有可共量性，於是又有「表現與被表現」的關係在其中。Irigaray 關於「換得」的模式著墨甚多，但「表現與被表現」的關係則甚少提到，只有一句也許只是無意使用到的「女性『代表』再生產的使用價值」（Irigaray 2005, 225），而這個「代表」還並非是表現與被表現關係，而更像是拜物的意思，女性身上有某種男性沒有的特質（再生產），而女性就「代表」著這種特質。Irigaray 一方面指出女性是被男性交易的商品，另一方面也指出女性與男性同在價值形式之中。前者是質上相異的部份，後者則是表現與被表現的部份。基於 Irigaray 對於「相對價值—等價物」關係的誤解，她也誤會了，女性佔據等價物的位置所表現的並不是男性獨有的價值，而是男女共有的價值。這使得她雖然把女性作為商品來分析，

但並沒有看清商品的雙重性與「人的雙重性」之重合。這一點，留至下一章再論。

**小結**

不管是 Jaggar 使用異化概念說明女性的處境，或是 Young 試圖使用性別分工作為一種新的概念框架來整合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以及 Irigaray 從女性作為商品的角度來批評《資本論》的男性中心，這三個例子都可以說明馬克思主義並非不適用於分析女性處境，只是在過去，它並沒有這樣的應用。作為關心「人的解放」的一種理論，馬克思主義為何有這樣的現象，是值得思考的。而上述這些馬克思的女性主義之應用也有許多問題，這也需要進一步的探索。在下一章將會從這兩方面進一步說明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限制，並由新的洞見得知在超越這些限制後馬克思主義的確可以適用於女性處境的分析，也就是，女性的馬克思主義。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第四章　全新的提案—女性的馬克思主義

由前面的討論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尚未有定論，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雖然追求著不同於「把女性帶進社會勞動」的女性解放，但是他們也未明確指出這樣的解放有著什麼模樣。會有這樣理論上的困境，源自於女性主義者本身就錯認了問題之所在。他們一方面信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不滿意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結果。女性主義者基於後者而想另闢蹊徑，但又基於前者的關係而無法如精神分析學派女性主義，或是後現代女性主義一般，從不同的理論框架中發展策略。女性主義者專注於女性種種的受迫現象，以致於他們過急投入問題之中，而沒有先看清楚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何以形成。

瞭解問題就是解決問題的一半。本文在此採取的策略是，先從「頭」開始瞭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所遇到的理論問題是怎麼來的，也就是，馬克思的性別盲是怎麼來的。會使用這個看起來比較迂迴的方式是因為，同樣基於信服於歷史唯物論此一研究方法，若把歷史的發展看成是一條通向大海的河流，我們在其中並不知道自己在河流的哪一個階段，而要從這角度瞭解這條河流的完整面貌，我們從所在的此處開始往回研究，就能對源頭有所瞭解，再用這一瞭解，鋪陳出從頭至今的發展運作，以勾勒出流歸大海的河道模樣。可是，若這一發展運作不適用於面對的處境，我們反而可以從這新的處境知道我們對於源頭的認知有錯誤，因此，馬克思的性別盲對於他的理論來說，與其說是缺點，不如說是一個縫隙，讓理論可以發展得更加完整。站在更遠的地方，發掘更原初的源頭。然而，當我們已經立基於錯誤的源頭認知上，卻還想要往下發展至終歸之處，勢必會受到阻礙，這就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所遇到的困境。

為了解開這個困境，本文嘗試先從馬克思的性別盲之歷史條件為何開始，瞭解馬克思的性別盲的成因，在解開馬克思本身的限制的過程中，也將會發現女性主義者本身的限制。兩者的限制實為一體兩面，也就是基於「表現—被表現」的關係所造成的認知受限。這個受限造成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有關於「只是馬克思主義的附加物」之焦慮。然而，若從「表現—被表現」關係看來，可以看到我們能做的不只是「使用馬克思主義來處理女性議題」，而是「使用女性觀點來處理馬克思主義」，這一反轉帶來的超越，形成了一種新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本文稱之為「女性的馬克思主義」。以下就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之歷史條件、女性主義

本身又有什麼限制，以及如何超越這兩者的限制分別論之。

###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之歷史條件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言之鑿鑿，然而有兩處地方我們應該要注意到：一、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是文本的，而非研究方法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檢索馬克思主義的文本發現其中沒有將女性以女性來討論的內容後，為獨立出「女性特殊壓迫形式」的分析，預設了在資本主義之外的另一體系「父權體制」之存在。並又利用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往「尋找父權體制的物質基礎」的方向發展。雖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不滿意，但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在解決那些馬克思主義無法解決的問題時，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認為要解決女性主義問題應使用唯物論，但他們對於研究方法的理解與使用卻並非全無問題，或者應該如此說，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使用這種研究方法還不夠徹底，即使他們「找出物質基礎」（如前所提，Hartmann 認為，父權體制的物質基礎就在於男性透過排除女性獲得基本工資工作與限制她們的性來對女性進行勞動力的控制），還是沒有說清楚，這樣的物質基礎何以成為可能？應該要更進一步透過對物質條件的批判，找到事情發展的脈絡。也因此，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沒有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內容是有其歷史條件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馬克思的理論發展是處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

馬克思本人是有意識到歷史條件的限制的，他在《資本論》中對亞里斯多德評論即充份說明瞭歷史條件對於一個人的思維是有影響的。[22] 當我們有更高的發展，我們才能看清過去的脈絡，任何我們對於現今狀態的描述，

---

[22] 「但是亞里斯多德沒有能夠從『價值形式』本身讀出：在『商品價值』的形式裡，所有勞動都是作為相同的人類勞動、從而作為『無差別的』而被表達出來的。這是因為希臘社會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的、也就是以人類的不平等、從而人類勞動力的不平等，為其自然基礎的。……亞里斯多德在『商品的價值表達』裡發現了一個『等同關係』，正是在這裡，閃耀著他的天才。只不過他所處身的社會的歷史限制，阻礙了他去發現：這個『等同關係』究竟『其實』何在。」（Marx 1972D, 74-75，譯文有所更動）此段原文為„Daß aber in der Form der Warenwerte alle Arbeiten als gleiche menschliche Arbeit und daher als gleichgeltend ausgedrückt sind, konnte Aristoteles nicht aus der Wertform selbst herauslesen, weil die griechische Gesellschaft auf der Sklavenarbeit beruhte, daher die Ungleichheit der Menschen und ihrer Arbeitskräfte zur Naturbasis hatte… Das Genie des Aristoteles glänzt grade darin, daß er im Wertausdruck der Waren ein Gleichheitsverhältnis entdeckt. Nur die historische Schranke der Gesellschaft, worin er lebte, verhindert ihn herauszufinden, worin denn "in Wahrheit" dies Gleichheitsverhältnis besteht.“（Marx 1867）姑且將引文中的亞里斯多德置換為馬克思、恩格斯，將奴隸勞動置換成性別分工，應能用來說明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之於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何在。

都只能是一種事實的陳述，而看不出在整體動態發展中的意義。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也說了，瞭解人體解剖後，才能看出猴體解剖的意義（Marx 1972B, 756）。如果直接借用馬克思的方法，而沒有依所處的歷史條件重新分析，那麼就如同用猴體解剖來看人體解剖，所能看到的只有一堆難解的謎團。因此，我們要學習的是解剖的手法，而非解剖的結果。那麼讓我們來看一下馬克思到底講了什麼，他所使用的解剖手法為何？

馬克思的資本論起於對商品的分析，他認為商品有兩個因素：使用價值與價值。這兩個因素的關係如同一張撲克牌的兩面，前者像是每一張撲克牌不同花色的那一面，後者則像是每張撲克牌相同花色的那一面。各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它們的有用性，如一個火柴的使用價值是燃燒、衣服的使用價值是保暖，水的使用價值可以是解渴、滅火、灌溉，即使是同一個商品，它的使用價值也會有所不同。使用價值是質上各異的，就像梅花 A 與方塊 J 的不同。價值則是各種商品之間可共量的部份，就像重量、長度等。[23] 價值是商品一個可以被公允標準衡量的東西，這也是商品之所可以交換的原因，馬克思認為價值來源即是人類的勞動。一個商品，因為有質上相異的使用價值，且有量上可共量的價值，所以才需要且得以交換。舉例來說，在遊戲進行中，若我和你手上拿的皆是黑桃 A（使用價值相同），那麼我們沒有換牌的需要；若我手上拿的是撲克牌，你手上拿的是麻將牌（沒有可共量性），那麼我們也不可能進行交換。

那麼商品的交換關係又有什麼意義呢？馬克思從最簡單的交換關係，也就是只有兩個商品在交換的情況說起。對此，他稱之為簡單價值形式，這形式為「相對價值＝等價物」。從對價值形式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關係其中也有「表現—被表現」以及「主動—被動」的關係。當商品 A 與商品 B 進入交換關係時，一個商品是相對價值，一個商品是等價物。位於相對價值的商品，所展現的是它使用價值的面向，而位於等價物的商品，則是用它的商品體來表現價值的數量。也就是，用它具體的身體來表達那個抽象的、可共量的東西。以馬克思用的羊毛衫與麻布為例子說明：

[23] 價值可以用度量衡的觀念來理解，但是它與重量、長度、體積這種物自有的性質有所不同。價值是由人賦予產品的性質，並非物體本身就有的。

1 件羊毛衫=20 匹麻布

假設是羊毛衫是在價值形式左邊的相對價值，麻布是價值形式右邊的等價物，那麼我們可以說，麻布的價值體被羊毛衫拿來表達內含於羊毛衫內的勞動量。也就是，麻布的使用價值被用來表現為羊毛衫的價值量。如此看來，位在形式左邊的相對價值羊毛衫為主動，位在形式右邊的等價物麻布為被動；然而同時羊毛衫的價值是「被」麻布表現出來的，而麻布則表現了羊毛衫的價值。如此，羊毛衫是「被」表現者，麻布是表現者。當商品進入關係之中，它只能呈現出它使用價值與價值這兩面中的一面。也正因為它有兩面，所以它必須進入關係之中，才得以表達它的雙重性。

而馬克思也在資本論的註解中提到過：「在某種意義上，人和商品一樣。」（Marx 1972D, 67，譯文有所更動）[24] 在這個註釋中，馬克思又說道：

> 「因為人既不是帶著鏡子來到世上、又不像費希特派哲學家那樣『我就是我』（Ich bin Ich），所以，人首先是在一個別人那裡映照出自己的。一個人彼得會把自己看成『人』，只是由於他把另一個人保羅看作和他同類的。這樣，保羅的血肉之軀，也就對彼得來說，是『人』這個類的表現形式了。」（Marx 1972D, 67，譯文有所更動）[25]

這邊可以看出，馬克思認為人與人之間是有照映的關係的。保羅的血肉之軀被彼得用來表現「人」這個類，像是麻布的商品體被羊毛衫用來表現它的價值量。羊毛衫並不會隨意站在一顆從天而降的隕石前，用它照映出自己；人也並不是隨意站在一個人面前，就映照出自己的。正如同馬克思對亞里斯多德的評論，說亞里斯多德因為其歷史條件而無法看到商品為何可以交換，馬克思也因其歷史條件而並沒有說清楚是在哪種意義上，人和商品是一樣的。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可能會注意到的是，當馬克思在嘗試說明這個情況時，他所能舉出的例子只是彼得與保羅這兩個「人（man, not human being）」。女性主義者可能會進一步追問，為何彼得是把保羅而非瑪麗看作和他同類？

[24] „In gewisser Art geht's dem Menschen wie der Ware.“（Marx 1867）

[25] „Da er weder mit einem Spiegel auf die Welt kommt noch als Fichtescher Philosoph: Ich bin ich, bespiegelt sich der Mensch zuerst in einem andren Menschen. Erst durch die Beziehung auf den Menschen Paul als seinesgleichen bezieht sich der Mensch Peter auf sich selbst als Mensch. Damit gilt ihm aber auch der Paul mit Haut und Haaren, in seiner paulinischen Leiblichkeit, als Erscheinungsform des Genus Mensch. “ （Marx 1867）

以馬克思主義的方式回答這問題，我們必須要知道，為何彼得可以把保羅看成他同類？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要先反過來問，我們如何知道彼得把保羅看成了他同類？利用馬克思對於商品的分析來分析這個問題，商品之間可以交換，這是商品進入交換關係後我們才能知道的事，但這並不是說，商品之所以可以交換，是因為他們進入了交換關係，而是，因為它們可以交換，所以才有交換關係。且，商品之間並不是透過彼此照映出自己為「商品」這個「類」，那麼，人與人之間表現與被表現的那個「人」「類」，是什麼？又，我們可以從什麼關係看到人與人是相同的呢？或說，人有什麼身份是以相同的面貌呈現的呢？最後一個問題，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有提及答案——公民。

「公民身份」並不是一開始就對所有人開放的。在英國，十八世紀末葉時，雖然城市中的投票權比較普遍，但在鄉鎮中投票權僅限於有土地且年收入至少四十先令的（男）人行使（Roskin 2003, 35）。到了 1832 年的改革法案通過之後才有較多的中產階級擁有投票權，這增加了二分之一的選民，但也只有 7%的成年（男）人有投票權。要到 1884 年，把（男性）農民也加入選民之中，所有的成年男性才都擁有投票權（Roskin 2003, 36）。而英國女性則是在一世紀之後才獲得她們的投票權。若我們能夠先放下女性主義對這個歷史過程的可能批評，不去指責為什麼「他們」男性先獲得投票權，「我們」女性遲至 1893 年才由紐西蘭首開先例，擁有投票權，以全人類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投票權範圍是不斷擴大的，並也是不斷被質疑與挑戰的。爭取投票權的過程，可以看作是人類對於什麼是構成了「人類」的條件的改寫。會這樣說是因為，公民這個身份不同於市民，它表示的是人的統一面，當人作為公民存在時，他們的相貌完全一致，這表現在投票過程中就是每個人都是那一個選章符號。市民則不同，當人作為市民存在時，每一個人都有著不同的性質，面貌相異。

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提到：

> 「在市民社會中，人是世俗存在物。在這裡，即人對自己和對別人來說，都是實在的個人的地方，人是沒有真實性的現象。相反地，在國家中，即在人是類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像中的主權的虛擬的分子；在這裡，他失去了實在的個人生活，充滿了非實在的普遍性。」（Marx 1972A, 428）

在政治國家中的人，也就是公民，他是一種抽象的存在，他是由人設想出的空泛的普遍性，但他才是真正的人，因為透過這種形式，人得以用一種「類」的方式存在，每一個人都相同，是真正的共同體；相對於此，在市民社會中的個人，也就是市民，是現實的人，活生生的人，實在的個人，正因如此，每一個人也都不同。公民與市民這兩個身份的關係這就像是商品有價值與使用價值這兩個因素一樣。就構成因素的角度來說，公民與市民是相對的，但是這兩者的主體都是個人（individual），只是因為人站在不同的位置，進入不同的關係之中，所以展現出不同的樣子。就如同商品在相對價值及等價物的位置時，所呈現出的面貌也會不同。公民身份讓人得以表現他與其他人是一樣的、有共同性的一面（平等）；而市民身份讓人展現他與每一個別人都是不同的那一面（差異）。然而人並不是只有平等面或只有差異面，這兩者是同時共存在人上的，因此，一個人要擁有公民身份與市民身份才有機會表達出他這兩個面相，也就是，完整的人。從這個意義上去思考民主化的過程，可以這樣說，過去只有少數的人可以表現他與其他人的共同性，那時世上還有一大半的人（女性、非白人、特定年紀以下、沒有擁有特定數量財產的人）無法表達他與其他人的共同性，或說，他們「被視為」是與「我們」不同的。當還有部份人只有市民身份而無公民身份，他們就無從在政治國家中表達自己與其他人的共同性，這反映的就是「人」並還沒有成為「人類」的存在。反過來說，那些已經表達了自己與其他人的共同性的公民們，他們的共同性其實還不夠普遍、徹底。

在馬克思的時代，還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國家的女性擁有投票權。女性只是市民，她只能表現與其他人是質上相異的，而沒有表達自己作為「人類」這個共同體的機會，因此馬克思終究無法得以「看見」女性與男性都是相同的這件事，這是馬克思性別盲的歷史條件。這造成馬克思在理論上仍有部份的性別歧視，除了在本文第 23 頁所提的《哥達綱領批判》中對婦女勞動的看法之外，在其中，他也認為有結婚和沒結婚的工人是不一樣的，這是因為他預設了（男性）工人必須養（女性）伴侶，也就是說女性本來就是在家給男性養的。[26] 由於時代限制，馬克思並沒有察覺到他的這種性別歧視，他在《巴黎手稿》中也說：「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類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

[26] 「其次，一個勞動者已經結婚，另一個則沒有；一個勞動者的子女較多，另一個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在勞動成果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品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Marx 1972C, 22）

因為整個人類奴役制包含在工人同生產的關係中，而一切奴役關係只不過是這種關係的變形和後果罷了。」（Marx 1972F, 101）然而，有性別歧視以及性別盲並不代表馬克思的思想是有錯誤的。因為，對馬克思來說，就算把所有人都放進公民的範圍內，也不是人類真正的解放。他認為，把財產限制從投票權中移掉，是人以政治的方式（抽象普遍人的身份）來揚棄私有財產。這是私有財產的政治解放，政治解放並不就是全人類的解放，它的限度表現在：「即使人還沒有真正擺脫某種限制，國家也可以擺脫這種限制，即使人還不是自由人，國家也可以成為共和國。」（Marx 1972A, 426）即使，人透過公民的方式得以超越差異，但這並不是真正的解放，因為差異實際上仍然以市民的方式存在著。政治國家，或說公民身份，是一個媒介，藉此活生生的人可以超越了一些具體的屬性限制（財產、宗教、性別等），但同時，國家也允許了這些限制以它們固有的方式發揮作用（Marx 1972A, 427）。也因此，女性主義者對於性別平等權利的主張並不會讓女性獲得真正解放，這是性別的政治解放，女性只是取得了性別自由。[27] 這反而是肯定了政治國家的存在，而政治國家的存在，即代表人仍然以公民與市民的雙重性生活著，他一方面是個社會的存在，另一方面以私人進行活動。人的普遍利益與他的特殊利益會產生衝突，這是因為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裂（Marx 1972A, 428）。這種把人分成公人與私人的雙重性，正是政治解放的完成，而不是人類解放的終點。

馬克思關注的焦點並不是如何消滅宗教、性別等等特質在「現實生活」中的運作效果，馬克思所關心的是要超越這種種因素，達到「人的解放」—市民在現實生活中可以經驗到公民那種「類」的存在—公民與市民的界線消弭了。這對未來的展望，是女性主義與馬克思的聚合點。可是要注意的是，馬克思關心的是從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而不是某種特定屬性的政治解放。女性主義者若要拿他的理論來處理女性實際的處境、性別所造成的現實效果，這好比拿養生保健的理論來治療愛滋病一般。若從公民身份的取得與對人的普遍性的概念之關係，那麼我們也可以說，馬克思除了性別盲以外還有種族盲，他的盲目並不是針對性的，而是受制於他的歷史條件。造成這種歷史條件的物質基礎就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帶來的生產模式改變，原本以家為生產中

[27] 「利己主義的人……市民社會的成員，就是政治國家的基礎、前提。國家通過人權承認的正是這樣的人。……人並沒有從宗教中解放出來，他反而取得了宗教自由。他並沒有從財產中解放出來，反而取得了財產自由。」（Marx 1972A, 442）

心，男性與女性皆投入生產過程，但當生產中心移至工廠，帶來的效應是：男性進入工廠工作，女性留在家中進行勞動。這讓男性與女性的生產場域分離，男性在「公領域」生產出物，女性在「私領域」中生產出人。他們的生產過程看起來也是分離的，他們的勞動所生產的結果也看似是不可交換的，這反映的是生產者之間看來也沒有普遍性存在。

### 第二節　拜物的女性主義

馬克思受制於他的歷史條件，讓他甚至無法關注到除了階級壓迫以外，還有許多其他形式的壓迫，即使那些受害者遠比加害者人數要來得多。他也無從注意到，自己的理論有女性主義者所批評的性別盲之問題。然而，性別盲的說法，其實有一個前提，也就是「性別」的確存在。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雖然反對基進女性主義那種把女性本質化與普遍化的分析方式，但他們在說明性別如何形成時，也是把生理性別作為論證的基礎之一。性別得以確立的基礎是「男女之間有一個生產能力上的差異：一個生理學基礎的差異，只有男性可讓女性受孕，只有女性可生出小孩。」（Jaggar 1983, 135）Young 也認為性別分工是最初的分工形式，而女性是因為接近了生產工具而得以逃過被宰制的處境。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雖然發展了很多說法來討論性別是如何在社會中被形塑與強化的，區分出「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說法，但這種作法也再一次確認了「性別」的「僵」界。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之有效性在於透過從資本主義之前到資本主義的觀察，他發展出了超越資本主義的概念。他看到構成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元素是階級，也說明瞭階級是如何產生的，因此同時也設想出了在階級之後的發展。馬克思並沒有因為看到「工人」被「資本家」剝削而認為「工人」應該要和「資本家」一樣分享「利潤」，也沒有因為看到「資本家」掌握生產工具而得以剝削「工人」，因而認為「工人」也要掌握生產工具。他的提案是消滅同時劃出「資本家」與「工人」的那條線，也就是私有制。

階級作為馬克思理論的核心，它並不是從天而降地被用來解釋所有壓迫、剝削現象。是有一個外於階級的因素決定了「人」進入哪個階級，也就是生產工具的掌握與否。一個人並非因為他是資本家所以他掌握生產工具，而是因為他掌握了生產工具所以他是資本家。階級是馬克思理論的核心，也是馬克思理論所要消滅的首要對象。反觀性別，對於女性主義來說也是理論核心，

但基於「女體生下小孩」這個物質基礎，女性主義者始終找不到一個他們可以接受的、外於性別的解釋項，來說明人是怎麼進入「性別」。這是因為，（至少在本文所提及的）女性主義者的視野中，無法設想出一個沒有性別的情況，於是也就沒有「進入」的過程。性別是「被給定」的，或終將被給定的。人不是一出生就有生理性別，就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有了社會性別，而社會性別又預設了性別的先存。於是，可以這樣說，女性主義者也基於男女在生育能力上的不同，認為人始終是被畫分成不可調和的兩類：男性與女性，且這兩類有著彼此獨立且相異的屬性。在這個前提成立的條件下，性別盲的批評才是有效的。女性主義透過女性處境看到過往理論忽略的再生產領域，並看到男性與男性所負責的生產領域是理論的核心，因而發展出關於女性與女性所負責的再生產領域這一塊的理論

女性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為了滿足解釋女性處境的需要，不斷地強化著男性—生產／女性—再生產的這種劃分。雖然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同時是生產者與再生產者，然而基於「女體生下小孩」這個物質基礎，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並不因此認為男性在再生產領域是和女性是一樣的。他們認為女性的解放是要透過她們所負責的再生產領域之解放才能達成，當男性支持再生產領域解放的政策時，女性主義者也認為，那只是因為這種政策可以滿足男性的私利，而不是因為他們願意支持「女性的」權利。當男性不支持墮胎權時，女性主義者指稱男性藉此強迫女性生下女性不想生育的小孩；當男性支援墮胎權時，女性主義者則說那是因為這樣可以讓他們不會有不想養育的小孩，墮胎權讓男性不再「負責任」。當男性與女性的立場不同，女性主義者說這是男女的性別利益衝突，當男性與女性立場相同，女性主義並不會認為這是因為男性與女性有共同的利益，而只是因為，這剛好也符合了男性的私益（Jaggar 1983, 237）。女性主義者並沒有看到，男性，同樣身為人類，也受制於生產／再生產劃分。若女性主義者質疑馬克思的（生產）解放是否可以解放女性，那麼，反過來說，是不是可以質疑女性主義者所提的再生產解放能否解放從事再生產的男性呢？

女性主義研究著男性—生產／女性—再生產這種劃分，把這當成研究問題的同時也把它當作前提。會有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女性主義的生理性基礎讓它的理論有將再生產拜物為女性的傾向。也就是「只有女性可生出小孩」這個物質基礎讓女性主義停留在「再生產就是女性獨自承擔的」這種意識型態之中，這同時也就確立了其他基於性別的劃分。基於這種肯認劃分的意識

型態，造成女性主義者在指出馬克思的性別盲後並無法跨越馬克思的理論。像是 Hartmann 認為馬克思提出了對結構的分析，但他無法說明為何是某種人填入結構中的某個位置。那是因為對馬克思來說，人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因此，哪一個人填入哪一個位置，對他來說並不是一個問題。[28] 女性主義者「看到了」人被以本質上不同的方式來對待的歷史結果，但在質問這個歷史結果的同時，他們把女性與男性看作「本質上」是不同的，因此，才會對於馬克思的性別盲感到不滿。這種把再生產拜物為女性的傾向也能解釋為何 Young 認為性別分工是最初的分工形式。再來，Jaggar 在她的文章中討論到女性生小孩的異化，她想生多少與她到底生了多少是兩回事。這種說法預設了女性身體只是「女性的（形容詞）」身體，小孩只是「女性的（所有格）」小孩（Jaggar 1983, 310），在這樣的情況下，無法生出小孩但又有需要生出小孩的男體們只能夠利用外在的條件控制女體。最後，Jaggar 指出工人異化是普遍，女性的異化是特殊形式，她沒有看到男性與女性都有的異化，工人異化也是一種特殊異化，還有一種更普遍的，人的異化。（至於與自己的生產或再生產異化，留至下節詳論）

另外，Irigaray 認為女性代表了再生產的使用價值，而對男性而言再生產是不可或缺的事，於是男性一定要擁有女性。這種說法預設了再生產是女性獨有的能力，男性本身沒有再生產的能力，所以他必須獲得女性才能夠擁有這種能力。從這種再生產拜物的概念出發，她指出男性是透過交易行為來獲得女性，這是整個社會與文化的基礎，因此把女性作為商品進行分析。她一方面認為商品的價值無法從自身之中尋得，又認為女性在市場上的價值是根據作為男性勞動產物而定。用馬克思的理論（它雖然是性別盲的，但同時也無再生產拜物的問題）來檢視這種從再生產拜物概念發展出的說法可以發現：這樣理解女性，是把女性視為價值並不在其中的商品，她變得是被男性添加價值的自然物，她是一具等待被施加（男）人類勞動的身體而已。也可以說，把女性視為是由男性賦予價值的商品，意味著女性的再生產並非一種人類勞動，因為價值是人類勞動的表現，再生產若是一種人類勞動，那麼它

[28] 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的立場，可以佐證這個說法。他終極關心的是如何突破現有公民與市民之間的區分，讓活生生的人成為真實的人。特別的屬性，如財產、宗教、種族，與性別，這些在政治國家中是市民社會的事，每一種屬性在市民社會中有它的運作效果，馬克思大部份在說明的是財產的效果，他也沒有宣稱這是其他屬性運作效果的樣板。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對於馬克思的批評其實不完全正確，因為若如他們所說，馬克思的失誤並不在於他的理論本身，而是他的理論看似無法運用到他沒說的領域之外。但從 Jaggar 與 Young 的嘗試可以看到，在資本主義中的女性是可以適用於馬克思的理論的。

就應該可以表現為價值。然而，（女性所從事的）再生產其實的確是一種人類勞動，因此可以說，她對馬克思的批評再一次反映了「女性並非人類」的這種悠久的性別偏差概念。

當然，把再生產物化為女性並不是女性主義獨有的狀況，女性主義的出現反而是指認出了這種狀況。然而若女性主義的目標是要消滅女性的不利處境，就不能只停留在這種意識型態之中。現在我們可以知道，女性主義所指的再生產並非女性所獨有的特質，生育這件事並非女性一人可以獨力完成，它獨佔女體進行整個過程的這個事實，成為了再生產具體化的唯一管道。在過去的物質條件下，人們只能從女體產下嬰兒觀察到人的再生產能力，因此發展出了只有女性有再生產能力的這種意識型態。現今的科技發展讓我們瞭解到懷孕並非女性一己之力，小孩的性別並非女性的肚子所決定，也有了確認生父的技術，可是基於舊有的物質基礎所發展出的意識型態依然活躍著。這種把再生產物化為女性的傾向對於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理論有什麼影響，將在下節說明。

## 第三節　生產與再生產—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之關係

女性主義者指出，馬克思主義只看到由男性主宰的生產領域之壓迫與解放，基於這種情況，女性主義者關注的是過去由女性所負責的再生產領域之理論的發展。女性主義者從女性處境的觀點看到生產與再生產的關係是交互影響，並拒絕接受馬克思主義那種「生產決定一切」的看法。然而基於生理性的物質基礎，女性主義者在再生產領域中仍將男性與女性視為質上有差異的兩類。這種基於「女體生出小孩」而有的意識型態所產生的問題，被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理論逼進，而造成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理論兩難。因此，要解決這個困難，應該要從「女體生出小孩」的再生產領域下手，重新拆解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

### 一、再生產的再瞭解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認為過去的理論只討論生產領域的問題，而沒有看到女性所負擔的再生產領域之問題，因而他們發展了許多關於再生產領域的理論，他們認為女性的不利處境是因為她們擔負再生產的勞動，而他們所討論的再生產，主要指的是和「生產出人」相關的勞動。其實

就這個定義，馬克思主義的文本中也並非全無討論，只是如前所述，受限於歷史條件，關於再生產並沒有更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如恩格斯所著（多整理自馬克思手稿）的《家庭、私有制及國家起源》中，在序言就有提到：

> 「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勞動愈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愈受限制，社會制度就愈是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係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關係為基礎的這種社會結構中，勞動生產率日益發展起來；與此同時，私有制和交換、財產差別、使用他人勞動力的可能性，從而階級對立的基礎等等新的社會成份，也日益發展起來；這些新的社會成份在幾世代中竭力使舊的社會制度適應新的條件，直到兩者的不相容性最後導致一個徹底的變革為止。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於新形成的社會各階級的衝突而被炸毀；組成為國家的新社會取而代之，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在這種社會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從此自由開展起來，這種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構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歷史的內容。」（Engels 1972, 30）

由此可知，就恩格斯從唯物主義的角度看來，歷史的決定性因素有兩個，直接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其中，生產又分為兩種，一種是物的生產，一種是種的生產。然而，他所說的「再生產」是什麼？在此他並無再多有著墨。他所稱的「種的繁衍」與女性主義者所講的「再生產」看來有重疊之處。他對這兩種生產做了進一步的解釋，這兩種生產都會對社會制度產生制約作用，而他認為，這兩種制約作用是呈此消彼長的關係。制約作用其一是血族關係，這種關係其實有不同種類，但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可以知道，（至今）這種關係大多是父權體制。另一作用則

就是人—物關係，這種關係也是有不同種類，只是目前是資本主義。兩個作用力的關係雖然是此消彼長，但這裡恩格斯所觀察到的是，先由血族關係具有較大的制約力，再來才是人—物關係具有較大的制約力。這個先後順序從何而來，恩格斯再一次沒有多做說明。他也看到了，這兩種作用力所造成的不同形式的社會制度會有一個適應過程，這點，Hartmann 對於家庭薪資的分析可以作為一個例子。不過恩格斯認為最後家庭制度會受到所有制的支配，也就是說，血族關係（人—人關係）的制約力最終是被人—物關係的制約力給克服。然而為何會如此，恩格斯還是沒有多說。在這段序言的最後一句話可以看到一個隱含的因果關係，當家庭制度（人—人關係）完全受所有制（人—物關係）的支配，階級對立與階級鬥爭才有完全發展的可能。從這一點也許可以這樣說，當（女性主義者所關心的）家庭制度還沒有被（馬克思主義所關心的）所有制支配前，共產主義所講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沒有發生的可能。那麼這也許能呼應 Hartmann 認為的「若女性主義議題的研究與實踐被遺棄，對抗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的鬥爭是不可能成功的。」（Hartmann 1981, 32）

如前所提，女性主義者對於女性的觀察著重於「再生產」，這個就成為了遠於馬克思的研究的新立足點。馬克思的研究針對的是「人生產出物」，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研究主要放在「人生產出人」，兩者其實都只有看到生產的一半。對馬克思來說，他關心的是人生產出物的勞動力；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來說，他們看到馬克思的關心預設了「生產出物是由男性負責」這個前提，而他們認為生產出人的勞動力與生產出物的勞動力是不同的勞動力，又因為他們認為這種生產出人的勞動力「只有」女性所有，或說，獨由女性所承擔，因此他們對於馬克思所做的分析才會感到不足。然而，若從「再生產是人生產出人」的角度來說，這件事不是只有女性「可以」負責的。一方面，每日的例行事務並非只有女性才可擔任，獨居的男子也完全可以再生產出他下一日的勞動力。另一方面，生殖這件事也並非女性一人獨力完成的。這兩方面正是讓再生產成為問題的關鍵。

過去對於生殖的瞭解不夠充份，加上再生產出人的過程只在女體上表現出來，而小孩出生後，「最自然的」食物就是母乳，因此，在個人成長的最初期，「看起來」是由女體在養育的。在這樣的物質條件下，作為人類發展必須的再生產只有可能被認為是只有女性在做的事情。然

而我們現在清楚的知道，人之所以可以生出人，並非單一性別可以辦到的事情。此外，透過資本主義的發展，我們可以瞭解到，人除了生出小孩作為新的勞動力，人本身日復一日地也在進行著勞動力再生，這也正是剝削得以發生的物質條件。然而，從女體生下小孩這個物質條件，女性進一步擔任著「照養」工作，人吃著女性準備的食物，看起來像是人因女性的照養而再生出勞動力。基於生育與照養這兩方面的物質條件，有了「女體在養育勞動力」的意識型態，也就是把再生產拜物為女性。我們知道，人都可以從事生產與再生產，但「女體生產出小孩」這個物質條件，讓人將其實兩性皆有參與的再生產過程（生出小孩），以及兩性皆可做到的再生產能力（勞動力的再生）視為只有女體擁有的能力，因而區分出擁有女體的女性與不擁有女體的男性。於是可以這麼說，性別的源初並非是女性被排除在生產領域之外，相反的，是男性被排除在再生產領域之外。

我們無法得知，為什麼人類在生殖的過程中必須要有兩種不同的身體才能夠完成（或說這並非學術，至少並非本文要處理的事），但因為初期對於再生產勞動不夠理解，所以有這是只有女性從事的勞動的錯誤意識型態。關於女性處境的討論很容易淪為本質主義的討論，原因正是於此。再生產確確實實並非女性的本質，這個新的理解有什麼政治上的意義呢？這要回到馬克思對商品最初的分析，也就是簡單價值形式中去找尋答案。

二、使用價值與價值到相對價值與等價物的被表現與表現關係

Irigaray 在〈女人的市場〉中直接把女性比作商品進行分析，而到馬克思也在《資本論》中提過「在某種意義上，人和商品一樣。」（Marx 1972D, 67，譯文有所更動），[29] 現在我們在新的立足點上，再把馬克思對商品的分析重播倒映在人身上，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商品有使用價值與價值，使用價值是商品固有的物質性，價值來自於人的勞動。在說明商品本身有兩種因素之後，馬克思往價值形式探索，他從簡單價值形式開始。如在第四章第一節所提的，簡單價值形式由相對價值與單一等價物構成，其中，相對價值的價值由等價物的使用價值

[29] „In gewisser Art geht's dem Menschen wie der Ware.“（Marx 1867）

表現出來。人，和商品一樣，有使用價值，也就是人的身體，人無法給出他沒有的東西，因此人本身也有生產勞動。人生產出人的勞動（也就是本文中女性主義所稱的再生產）是生產出使用價值，人生產出物的勞動（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所稱的生產），在交換關係之中，表現為價值。商品的雙重性其實來自於人的雙重性，也就是再生產（人—人）與生產（人—物）這兩種勞動。生產的使用價值是商品體，再生產的使用價值是人體。值得注意的是，正因再生產的使用價值為人本身，所以，再生產的勞動對象也是人本身，當人不在交換關係之中，再生產的勞動就不會表現為價值。由此可知，在家庭被視為社會最小的單位（unit）的情況下，在家庭之中進行的再生產勞動，並不會表現為價值。因為，在單位以內的交換並不能算作交換關係，如同我把我右手的筆和我左手的橡皮擦交換，這並不是一個交換關係。交換關係的前提是有兩個獨立的單位，拿我的交換你的，有兩個主體，才有所謂的關係。

由於在過去的物質條件下，只能觀察到女體生產出人體，於是再生產被拜物為女體，也就是說，女體的使用價值是再生產。其實原本人都有生產與再生產的能力，但因為物質條件限制而有的拜物傾向，再生產的能力從女性的（形容詞）變成了女性的（所有格），這讓男性只能透過私有制擁有女體以擁有（其實是自身的）再生產能力。這也就是 Irigaray 在〈女人的市場〉一文中所說的，男性一定要擁有女性，因為女性代表了再生產的使用價值（也就是女體）。從這個角度看來，女性主義者所關心的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與宰制，其實是源自於再生產被拜物為女體這個意識型態。這樣的意識型態也造成另一個問題，若我們從簡單價值形式來理解人—人關係，那麼可以這樣說，當甲在相對價值的位置，乙在等價物的位置，那麼我們可以說，乙用他的身體來表達甲的價值。在再生產拜物為女體的意識型態之下，相對價值可能是男是女，然而，等價物就有了男女的區別，當甲要表現他的再生產時，他必須選擇一位女性以她的身體來表現再生產；於是，當甲在人—人關係中要表現他的生產，也就是可共量的勞動時，他必須選擇男性。

這或許可以回答在第四章第一節結尾所提到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女性留在家中從事再生產工作，而男性投入工廠的生產勞動。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女性這麼晚才取得公民身份。在第四章第一節說明瞭，公民身份表現的是人的普遍性的那一面，女性的身體既然是被視為

生產出使用價值的，且，使用價值是質上相異、不可共量的，女性在這樣的條件下也被視為是沒有普遍性的。反之，從事生產勞動的男性，他們產出了可共量的價值，因此被視為是有普遍性的。然而，要注意的是，這種情況有一個前提，再生產是在非交換關係裡進行，且生產在交換關係裡進行。由於生產與再生產都是勞動，因此，生產與再生產的產物其實都具有可交換性，勞動力商品即是一例。家務勞動之所以不具有價值，不是因為它不是生產勞動，而是因為它並非交換關係中的勞動。以此來理解 Dalla Costa 與 James 的主張可以發現，家務勞動的確具有生產性，但它生產性必須在交換關係之中才能被看見。這也可以進一步解釋 Jaggar 所指出的，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下家務勞動既是生產的，也是非生產的，這種矛盾不只來自於馬克思主義中「生產」一詞的歧義，更來自於再生產勞動是否在關係之中被表現出來。

很明顯的，所有家務勞動的內容我們都可以在市場中找到，因此，可以得知家務勞動並沒有計價的困難。過去沒有給予家務勞動報酬的原因是如此一來它就是在交換關係之中。在交換關係之中意味著我拿「我的」和你換「你的」，然而在再生產被拜物為女體的這種意識型態之下的家庭關係，它所維持的正是男性與女性皆「擁有生產與再生產」這件事。[30] 因此，若在這種情況下家務計酬，則意味著再生產「的確」是「女性的」，而生產也的確是男性的，這也就如一些女性主義者所擔心的，認為家務勞動有給會加強女性在家的孤立。正因如此，家務勞動應該要計酬，因為這正可以打破再生產被拜物為女體這種意識型態所建構出的家庭關係。但是在現今的社會結構下，要避免馬克思主義者所擔心的，資本主義把手伸入家庭之中將一切商品化的狀況，家務勞動的酬勞應該是由國家來給付。

由此看來，傳統馬克思主義解放女性的策略不無道理，但女性參與社會生產的原因並不只是女性的壓迫處境源於她的經濟不獨立，女性作為人類，她同時是生產者與再生產者，所以除了再生產以外還要參與社會生產，這才能完整地發展她的勞動能力。然而女性主義者的擔憂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個策略並沒有同時也把男性還原為同時是生產者與再生產者的人，在這樣的狀況下女性就會成為雙工者，反而有著加倍的

[30] 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何一直有人要成家才算完滿的觀念。

負擔，這樣對於擁有女體的女性並不是一個適當的政策。

三、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對於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一直有歧義，也就是 Hartmann 的雙體系論與 Jaggar 與 Young 所主張的單一體系論。在以上對於再生產的重解之後，可以知道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並不是變數與變數之間的關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就有說到父權與私有財產是同時出現的，但如同馬克思的性別盲，恩格斯的歷史條件限制了他無從說明清楚父權與私有財產的關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明人—物關係的拜物，而本文則基於女性主義的洞見說明人—人關係的拜物，而這兩者皆出自於人本身的勞動。正是勞動的這種雙重性，讓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看起來似乎統一又似乎分立。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同時是從「拜物」發展而成的，因為拜物，所以產生了「屬性是物自有，而並非我自有」的這種意識型態。但是事實上價值是「我」給的，再生產勞動「我」也參與其中，拜物所造成的與事實斷裂，讓人發展出私有制以補回這樣的缺陷。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問題在於一方面把資本主義只視為現今社會的主要生產模式而沒有視作一種意識型態，另一方面又因也落入將再生產拜物為女體的意識型態，而沒有看出這兩種意識型態的物質基礎皆是人的勞動本身。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源頭出於同一處，所以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對於兩者的關係才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也因為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同時對這兩者的關注，才得以看到這最初的關係，解開謎團。因為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都出於人本身的勞動之拜物，因此可以說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於彼此的解放策略之懷疑都是正確的，但也是不充份的。因為若只有推翻資本主義，那麼只有人的生產勞動獲得解放；若只有消滅父權體制，則只有再生產勞動獲得解放。且，若從下層建築（具體物質）與上層建築（抽象勞動）的關係來說，生產出使用價值的再生產若沒有獲得解放，產生價值的生產也無法真的解放；反過來說，若產生價值的生產沒有解放，那麼生產使用價值的再生產也不是真的解放。

基於這樣的關係，就可以解釋為何恩格斯會認為一開始血緣關係，也就是再生產勞動，具有較大的制約力，再來才是人—物關係，也就是

生產勞動具有較大的制約力。這兩種作用力所造成的不同形式的社會制度會有一個適應過程，這正是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之間的關係。恩格斯認為最後家庭制度會受到所有制的支配，也就是說，血族關係（人—人關係）的制約力最終是被人—物關係的制約力給克服。以本文的立場，這段話不應只被理解為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終究會克服父權體制，而是說，在拜物的意識型態下，人—人關係實則是人—物關係。人透過私有制擁有「人體」這個生產工具，這應該是最初的私有制，而男性透過父權體制來擁有、掌控「女體」這個生產工具。從這個角度看來，性別的確是一種階級問題。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讓我們得以清楚瞭解人—物關係這一塊的意義，又因為女性主義的發展，我們才補齊了對於勞動的瞭解。從完整的人的角度看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評或女性主義對父權體制的批評都是不足夠的，兩者都把人只看成某一種勞動者，而沒有清楚看到拜物對於人的影響。但在舊有的意識型態之下，因為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發展，我們才得以把完整的人的樣貌拼湊起來。

**小結**

女性主義有著許多流派，它們承接了許多理論的特色，並看到理論的缺陷，但卻未曾挑戰到理論本身存在的論點。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一方面相信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個人自由與權利，卻也看到這樣的強調對於女性不利處境的於事無補；本文所提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也是如此，在批評理論的同時又肯認了理論本身的正當性，於是女性主義成為各種主義的附加物。至於作為單一主張的基進女性主義，它停留在「再生產拜物為女體」的意識型態而無法說明不同的身體有著什麼不同的意義，於是當要解釋因此而來的不同的境遇，容易有本質化的問題。在本章的討論中可以知道，將馬克思主義使用在女性主義議題上的前提是認知到「再生產被拜物為女體」這種意識型態。馬克思主義所批評的資本主義與女性主義所批評的父權體制實則是分別對人類生產與再生產這兩種勞動拜物的後果。然而，本文所提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未曾察覺到這一點，於是他們在使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時一方面對女性處境有更多的瞭解（因為同樣是拜物），另一方面卻又有被統合至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感（因為無法釐清生產與再生產的關係與意義）。當我們把握住這種再生產拜物的意識型態後，回頭再看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又能有更多的洞見。

在此，女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的是一個翻轉，而不只是補充。本文除了使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來理解女性主義，同時也使用女性主義的概念來理解馬克思主義。在過去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使用馬克思的概念來分析女性處境，本文的研究則開啟了使用女性主義的概念（也就是再生產之於人的意義）來瞭解階級與資本主義的可能。因此，可以這麼說，從傳統馬克思主義中的女性議題到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本文再向前跨一步，提供了「女性的」馬克思主義之可能。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第五章、結論

日前義大利總理倫齊（Matteo Renzi）針對義大利嚴重的失業率提出一連串的改革，其中包含支付薪水給家庭主婦的提案（李威撰 2014; Lizzy Davies 2014），此舉又引發了諸多討論。這項提案最先是由家暴防治慈善組織「雙重防護」（Doppia Difesa）於 2007 年所提出的，該組織觀察到有許多家暴受害者基於經濟依賴而未報案，並因此死於家中。在此提案中，家庭主婦的薪水將依家庭收入決定是由國家或是有顯著收入的伴侶所支付。提案支持者 Giulia Bongiorno（前國會議員、律師）指出，這項提案是基於平等以及保障女性不受到家庭暴力，並且，它肯認到家務勞動的社會尊嚴以及經濟重要性。透過這個提案，Bongiorno 希望能打破「我是賺錢養家的人，你什麼都不是。」的歧視，讓家庭主婦不再是次等公民。然而，如同本文在第二章第一節的討論，這樣的主張再次又引起了許多反對的意見，如記者 Giulia Innocenzi 在臉書上表示他反對這項提案。他認為要達到減少歧視的目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工作。杜林大學（University of Turin）的經濟學教授 Daniela Del Boca 則表示，儘管這項提案「理論上是公平的」，但家務津貼會嚴重降低外出工作的動機。她認為女性出外工作是富有意義的，不僅是對家庭收入或是自己經濟的獨立性，更對下一代傳遞了重要的訊息：「工作是重要的，並且是獨立的基礎。」Del Boca 認為這項提案的經濟獨立並非透過把家庭主婦拉出家庭領域達成，而是把她們留在一個從屬的角色中。儘管提案支持者認為家務有給將能對抗「家務就是女性做的事」的這種想法，然而 Del Boca 指出，2011 年，義大利只有 6.9%的男性選擇了育嬰假，在義大利這樣傳統性別角色根深柢固的國家中實行此舉是非常不實際的。她認為發錢給所有提供照護工作的人，這是好的，「但不是在這個國家、不是在這個時機，因為有太多的危機以及既存的歧視。」

由這樣的討論可以看出，時至今日，女性與再生產，以及再生產與生產的關係仍然受到本文所述的拜物意識型態影響著。這個討論會再度在義大利出現，應與義大利本身的勞動力市場結構有關，報導中提到，2013 年義大利僅有 46.2%的女性就業，可以看出大多數女性是留在家中未投入勞動力市場。這個提案再次受到許多反對意見，可以從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的立場來理解。若我們還未看清生產與再生產拜物的意識型態就嘗試做出改變，則將只會強化這種錯誤的意識型態。由反對者意見看來，工作被他們視為唯一的可行方案，但這背後隱含的是生產與

再生產的斷裂，以及公私領域的分離，而從本文的討論可以知道，生產與再生產、公私領域，和性別，都是人的雙重性經拜物後而發展出來的。如同 Del Boca 所說的，義大利是一個傳統性別角色根深柢固的國家，而她對於工作的推崇，更可以說明這個「傳統」。反對者的意見反映了「（女）人同是生產與再生產者」的真實，因而，女性應該也要出外工作，但在沒有重新反思「工作」，也就是「勞動」之定義的狀況下，反對者的意見同時又是維持現狀的保守意見。若 Del Boca 針對家務有給認為「不是在這個國家、不是在這個時機，因為有太多的危機以及既存的歧視」，那麼本文對此想提問的是「要在哪種國家？哪個時機？若什麼事都不做，又要到何時才能消除所謂的危機與既存的歧視？」

在經過 40 幾年之後，家務勞動有給的主張再次出現，並又再度引起反對意見，可見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至今仍未被釐清，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理論仍未妥善的運用在現實的議題上。對此，本文從家務勞動有給制的主張開始，依著使用馬克思概念的女性主義者的討論，一路探索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這些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不滿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女性解放策略，然而另一方面又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並認為馬克思的某些概念是可以用來處理女性處境的。這樣的想法讓他們一方面想要超越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卻也受制於馬克思主義。本文從 Irigaray 利用《資本論》來分析作為商品的女性這樣破格地使用獲得洞見，（女）人作為商品，他也具有使用價值及價值。（女）人這種商品的特色在於，他能自己生產出使用價值。以個人的勞動力生產來說，因為是在個人內部進行，所以這個勞動不會表現為價值；以產出新生的勞動力來說，受限於女體生下小孩這個物質基礎，在原初的狀態，人對這一塊再生產的瞭解只能觀察到這個現象，因而有把再生產拜物為女體的意識型態出現。然而再生產實則為人類共有的勞動能力，在這種錯誤的意識型態之下，人類發展出私有制以維持這個真實，家庭成為結合生產與再生產的單位。在家庭內的再生產勞動因為以這種意識型態來說並不在交換關係裡，所以也不會表現為價值。

這種拜物可以說明為何女性主義的討論容易有本質主義的問題，透過對生產與再生產這兩種勞動的分析，可以瞭解到性別產生的原因是來自於擁有（再生產被拜物成的）女體的人，以及不擁有這種女體的人。前者在性別裡被定義為女性，後者被定義為男性。然而若肯認到每個人都有生產與再生產，那麼就不再會有男性與女性的區分，剩下的只有純粹的、完整的人。因為人的兩種勞動，人必須在關係之中才能照映出自己完整的樣貌。在新的肯認下，在人—人關係中，人可以自由地選擇擁有男體的人或擁有女體的人來照映自己的勞動。再生產不再就是生

出小孩，因此它不一定是異性戀的，不一定是母親的，不一定是產乳的，不一定是女性的。可是這並不表示女性主義的關注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在現今的意識型態下，女性的確存在著，並也持續地受到性別的壓迫。這就像是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生產模式，但這並不代表對於工人處境的分析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在這種生產模式下，工人是確實存在的，並也受到剝削壓迫。

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我們得以瞭解人的生產勞動，而又因女性主義的發展，我們看到了人的再生產勞動。不管是生產出物的生產勞動，或是生產出人的再生產勞動，勞動必須要在關係之中才會表現為價值，因此，人是社會的動物，人若不在社會之中，他無法瞭解自己完整的面貌。可是，這種表現與被表現的關係也遮蔽了一半的真實。因為位於等價物位置的物或人，是用其使用價值來表現價值，這也開啟了拜物的可能。這種拜物在人—物關係之中發展成資本主義，在人—人關係之中基於女體生下小孩這個物質基礎發展為父權體制。馬克思說明瞭拜物的過程，但他受限於歷史條件，因而他說明的拜物對象並不完整，女性主義則補足了這一塊的分析。也因為女性的壓迫處境是源於將再生產拜物為女性這種錯誤的意識型態，於是馬克思關於人—物關係的分析會被認為是有性別盲的。生產和再生產不同之處在於，它沒有某種身體產出某種商品的物質基礎，因此在分析生產關係時，也就不會有性別這種意識型態。因為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皆出於拜物，所以使用馬克思的概念來分析女性處境——如本文前面所提的 Jaggar、Young，與 Irigaray——是可以增加對女性處境的瞭解，可是也因為生產與再生產勞動有不同的物質基礎，因此一方面會覺得馬克思主義為女性主義帶來新洞見，另一方面又覺得有不足之處。

透過本文的研究可以得知人皆有生產與再生產勞動的能力，但這並不是說在性別意識型態仍活躍的現今，要廢除一切女性與男性不一致的政策。相反的是，正因為看清性別意識型態是如何形成與運作，我們應該要正視的是「（女）人體生下小孩」這個物質基礎，以及生產與再生產是人固有的兩種勞動類型此一事實。在政策制定時應基於女體產出小孩這種物質基礎（而非意識型態）來做評估，如育嬰假從過去母親一年，改革為母親半年、父親半年，這反映了人在再生產中的權利與責任。至今的器物發展也反映了「人同時是生產者與再生產者」這個事實，女體與再生產的連結也隨著物質發展而有越來越多被削弱的機會。像是家務機器的發明，雖然女性主義曾指出這讓家庭主婦更孤立於家中，但在越來越多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承擔著再生產與生產者角色的同時，家務機器也讓男性有更多機

會從事家務勞動。[31] 又如奶粉等其他母乳替代品的發明，以及擠乳器、保存袋、冰箱、加熱器，與奶瓶、奶嘴等輔助物的出現，也讓生育這件事情與女性的連結開始可以不再畫上等號，女體也較不受到剛出生嬰兒的時空限制。

也因為人皆有生產與再生產的能力，可以知道過去理論把生產和再生產切為兩個獨立領域是不適當的，從女性的處境中尤其能夠看出這種不適當。從這個洞見出發可以更細緻地說明保護式政策的必須與危險之處，如在公職競選中的婦女保障名額，它是出於補救父權體制下對女性的壓迫，將女性視為獨占再生產能力的私人，提供她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然而這同時又可能再一次確立再生產與女性的關係。正視（女）人體生下小孩這個物質基礎意味著正視人體是有不同的特性，如女性身體的脂肪含量遠比男性身體高，肌肉量比男性少，同樣的訓練情況下也因為睪固酮分泌的差異而遠比男性難生成肌肉。然而這並不能又被拿來用作性別判準，認為肌肉發達的女性是「金剛芭比」、肌肉量少的男性「不是男人」。從是否擁有生出小孩的身體而發展出的性別判準應回歸到生產與再生產能力這件事本身。溫柔、照顧、細心等過去所謂的女性特質，應做如下理解：它是出於女體產下嬰兒後撫養小孩而發展出的，這些特質並非女性所特有，而是從事再生產勞動所有的特質。

再生產的拜物形成了性別，導致了女性的壓迫處境，然而它影響不只是女性，而是整個人類，它把人類切割成「最自然的」男性或女性。表現與被表現的關係讓人得以看到自己完整的面貌，卻也同時開啟了人以為這神奇是外於自己的拜物過程。當我們藉由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研究補足了對勞動的認識，我們才能夠知道這一切是源於自身的勞動，基進女性主義的口號「個人即政治」在此有了新的意義。在解開生產與再生產這兩種勞動中的拜物後，人才有可能拿回自己的力量，走向人的回歸。

[31] 這邊再一次看到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有著相互影響的能力，以本文立場也可以這樣理解：這是人類擺脫拜物的意識型態而有的發展。不同於過去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是一種雙重負擔，認為這出於資本主義的拉力，或是父權體制的推力，本文採取比較樂觀的看法，認為這是女性在父權體制下維持「人同時是生產與再生產者」這個真實的方式。器物的發展一方面支持女性脫離獨占再生產者的角色，同時也開啟了男性重顯再生產者此一角色的機會，如從事家務勞動的「新好男人」這種概念。要留心的是，這種概念是否又造成了新的性別刻板印象？要避免這種狀況，還是要從「人同時是生產與再生產者」這點出發。

# 參考資料


Althusser, Louis 著，杜章智 譯

1990，〈意識型態和意識型態的再生產〉，收錄於《列寧和哲學》，臺北：遠流，頁 151-206。

Engels, Friedrich 著

1972，《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27-203。

Irigaray, Luce 著，李金梅 譯

2005，〈女人的市場〉，收錄於《此性非一》。臺北：桂冠，頁 219-244。

Marx, Karl 著

1972A，《論猶太人問題》，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419-443。

1972B，《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733-762。

1972C，《哥達綱領批判》，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11-35。

1972D，《資本論》第一卷，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E，《資本論》第三卷（下），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F，《1844 經濟學哲學手稿》（本文內稱巴黎手稿），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43-181。

Roskin, G. Michael 著，鄭又平、侯漢君、姚朝森、黃烈修、郭正亮、陳恆鈞、陳銘祥 譯，王業立 主編

2003，《最新各國政府與政治：比較的觀點》。臺北：韋伯。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ng, Rosemarie 著，刁筱華譯

1996，《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文化。

上野千鶴子 著，劉靜貞、洪金珠 譯

1997，《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臺北：時報。

王瑞香 著

1996，〈基進女性主義〉，收錄於顧燕翎所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

Dalla Costa, M. and Selma James

1972.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Bristol: Falling Wall Press.

Hartmann, Heidi

1981.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Sargent.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Jaggar, Alison

1983.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J. : Rowman & Allanheld.

Sargent, Lydia

1981. "New Left Women and men: The Honeymoon Is Over." In Sargent.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Young, Iris

1981.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oery." In Sargent.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網路資料

2013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

http://www.weforum.org/reports/global-gender-gap-report-2013

最後查閱時間：2014/01/11。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行政院主計總處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33765&ctNode=517&mp=4

2013a

臺灣地區就業者按年齡、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分

http://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month/sex/4.xls

最後查閱時間：2014/01/11。

2013b

失業、就業統計速報統計表

http://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312238263SQ4VQLS8.pdf

最後查閱時間：2014/01/11。

2013c

我國女性社經概況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33111192471.pdf

最後查閱時間：2014/01/11。

李威撰

2014，〈義名人推家務給薪 倡女性經濟獨立〉，《立報》，3 月 10 號。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8301

最後查閱時間：2014/03/14。

高湧泉

2008，〈1609〉，科學人第 82 期 12 月號

http://sa.ylib.com/MagCont.aspx?Unit=columns&id=1303

最後查閱時間：2014/01/11。

陳清泉

2009，〈《女權天使》中的人權〉，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

http://hre.pro.edu.tw/zh.php?m=15&c=1254215938

最後查閱時間：2014/01/11。

Engels, Friedrich

1884.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http://www.mlwerke.de/me/me21/me21_036.htm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最後查閱時間：2014/02/27。

Marx, Karl

1867. „Das Kapital. Band I”

http://www.mlwerke.de/me/me23/me23_049.htm

最後查閱時間：2014/04/09。

Lizzy Davies

2014.3.7. “Italian campaigners call for housewives to be paid a salary.”

theguardian.com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r/07/italian-campaigners-housewives-paid-salary

最後查閱時間：2014/03/14。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